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陈锋 朱杰 钱照亮

陈童

编委 (按笔画为序)

任世红 李业 吴元庆 张吉林

张刚强 张美云 张思东 陈思

傅佩丽

主编 陈锋

副主编 陈思

目 录

2021年 第5期 总第133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宋 好
责任编辑:鲍跃华 吉 强 王天海 蒋建忠

本刊特稿

全面深刻理解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 魏晓东 4

统战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实体阵地探析

——以浙江省为例 / 许 军 14

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困境及创新研究 / 吉 强 22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工作实践路径研究

——以晋江市磁灶镇为例 / 钟 力 杨歆琦 29

政党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优势、功能和作用 / 许奕锋 谌 炎 孔建华 36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 年 11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民营经济

- 重庆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 / 宋晓云 45
- 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研究
——基于 J 省的调查 / 姜 力 54

中华文化

- 新生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 祝 阳 60
-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路径与对策研究 / 徐 清 70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1 * 2021 - 05

全面深刻理解统一战线 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魏晓东

摘要: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从中国特殊国情、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辩证关系、统一战线实质三个层面考察,都证明了这一科学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继续运用好这一法宝,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关键词:统一战线;中国国情;党的领导;重要法宝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04-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之一,强调指出“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理解为什么统一战线是个重要法宝,以求形成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认识,以便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服务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局。

一、从中国特殊国情的宏观层面考察,统一战线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宝

全面梳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关

重要论述,系统学习认真思考,是深刻理解统一战线是个重要法宝的逻辑起点。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统一战线重要性是从科学分析国情开始,而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个相当复杂且漫长的历程。早在1922年6月,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阵线的问题。中共三大通过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原则,不久,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打倒军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使党内一些对统一战线的建立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看法和主张,但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共党内对是否建立统一战线有了重大分歧。大革命失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企图变

收稿日期:2021-11-12

作者简介:魏晓东,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紧要关头，是否需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为中共高层领导面临的一大难题。面对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从理论上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给予充分论证的，是熟知中国国情且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的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重要文章中极为深入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认为，中国的国情有特殊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于国际国内敌我力量悬殊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革命不平衡的国情所决定的，不懂这两个不平衡就不懂中国国情。其观点是，从世界范围看，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个是反革命的力量比过去衰弱了，革命的力量比过去增长了；另一个是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的力量，存在明显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力量对比的敌强我弱。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了革命力量的不平衡。他告诫广大党员和国人，如果脱离国情，不能足够地估计到反革命力量和中国革命力量的强弱对比，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很担心党内的关门主义给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带来阻碍，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深入地论证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

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致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他反复强调，革命的方针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而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关键点。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敌强我弱的现状，产生了革命的不平衡，决定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分析国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2]不仅如此，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他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视为三大主要法宝，第一次把统一战线提高到法宝的战略地位加以强调。

毛泽东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放眼世界，通过深刻分析中国国情，讲透了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重要法宝的深刻道理，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正如《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现实是，革命的任务十分艰巨，而敌人空前强大，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不平衡，单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无法战胜强大敌人。党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必须依靠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样单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党要完成这个主要任务，必须依靠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

换句话说，统一战线之所以是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由党的任务艰巨而力量不足的不平衡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同理，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要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出发点，这个特殊性仍然在于新的历史阶段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需要系统学习和深刻领会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论述。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从分析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入手论证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用极大的精力去分析中国的国情，反复强调，我们所面对的社会主义仍极不成熟。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经济落后的大国，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他敏锐地观察到，国际国内存在着三个层次的不平衡。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表现为“南北问题”，南穷北富，是第一个层次的不平衡；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差距，中国慢周边快，是第二个层次的不平衡；我国东部及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相对发达而广大西部相对贫穷落后，是第三个层次的不平衡。他分析：“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3] 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国内区域之间的这种发展差异，给世界和国家范围内的经济共同发展带来了障碍。通过对国情的深入分析，一个新的不平衡的严峻问题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贫穷”与“落后”（主要是经济上的贫穷和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方面的落后）成为制约我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面对的新“敌人”。《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很显然，如此艰巨的任务，单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仍然不可能完成，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努力，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更加突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及其特征，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这一认识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不断深化，江泽民强调，“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胡锦涛提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之所以是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新的不平衡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放眼观察世界，提出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从深入分析新时代中国国情的新变化入手，创造性地论证了爱国统一战线是新时代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的道理。

纵观世界的新变化，他看到了国际国内两个范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关于国际范围的发展不平衡，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他指出：“贫富差距恶化，南北鸿沟扩大。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才能够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关于我国发展不平衡，体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新论断。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另一个是“我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主要矛盾的阐述突出了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将“不平衡”放在了“不充分”之前强调，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国情的突出特征，“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我们理解，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多方面，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居民收入的不平衡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平衡。《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完成这一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单靠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依靠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又讲，“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实践证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开拓改革路，实现中国梦，都需要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齐心协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之所以是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由中国特殊国情新的不平衡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从研究中国国情入手，指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揭示了

仅靠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和建设力量的单薄与党要完成带领人民取得伟大事业胜利的任务艰巨之间的不平衡，阐明了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须臾不可离开重要法宝的深刻道理。

二、从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辩证关系的中观层面考察，统一战线是时刻不能丢弃的重要法宝

从中国国情的宏观层面论证了统一战线是一个重要法宝之后，这个科学论断必然要在中观层面得到验证。1939年10月，毛泽东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阐释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中观层面论证了统一战线是个重要法宝的道理。

（一）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中观层面研究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辩证关系的是毛泽东。他研究这个问题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判断：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投降、分裂、倒退危险的日益发展以及由于这几种危险的存在使党在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二是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即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因为有了党的地位变化，大批的新党员和很多的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毛泽东指出：“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4]这就自然而然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5]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论证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

果我们党不是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后退一步。换句话说：“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6]只有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7]得出的结论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8]同时，他又对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互相关系。”^[9]通过学习毛泽东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一个道理，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事业得到了不断发展，而在领导统一战线发展的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得到不断地完善，这是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对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之互动关系这样论述，“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在第 20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因此，“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

项重要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真正抓紧抓好。”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论述党的建设问题时，特别注意对统一战线作用的诠释；在思考统一战线巩固与发展问题时，始终强调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作用。

（二）统一战线对加强和改善党领导的重要作用

党的重要领导人论述表明，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有着不可分离、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从统一战线发展史看，凡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而且党能够正确领导，统一战线事业就发展，由此推动了革命和建设进步；凡是统一战线事业能够健康发展，就必然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有独特的促进作用，由此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步。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统一战线是怎样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要在任何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建设史上，从来都是把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而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 1957 年的一次讲话中谈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六字方针时，有过明确的阐释。他说：“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

就是搞得太死，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0]邓小平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民主党派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和“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充分论证了统一战线对执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从党的历史看，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丰富与发展，依靠的是党和人民的力量与智慧。可以说，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包含着统一战线成员的贡献。

二是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力量，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戴。今天，更应该具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牺牲一切的无上的真诚、至高的热情、英勇的气概和宽广的胸怀，在领导统一战线的实践中，要一如既往地以协商的方式和民主的作风，以身作则地去影响和感动中国人民。党的作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命。要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自然要靠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努力。但统一战线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不可忽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所规定的我国多渠道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的原则和方式，使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有机会、有权利参政议政，对执政党的作风提出意见批评。来自统一战线的意见，无疑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参照。统一战线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包容体谅的工作方式，对中共进一步改善执政方式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是有利于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重要讲

话中指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对于一切违背和削弱这个思想政治基础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统战工作就是要弥合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差异，增强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解决的是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问题。按照“同心圆理论”，我们也可以把党比作是圆心，把人民大众比作是圆，统一战线就要做介于圆心和圆之间的半径，把党心和民心紧紧联在一起，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统一战线人才荟萃，联系广泛，党外人士集中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并且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有大量党外人士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党就能够团结到更多的党外人士，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同时也能够巩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就必然能够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三）党的领导对统一战线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而党的领导是巩固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关键，这是百年以来的一个基本经验，主要是由党所具有的先进性所决定。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1]

其一，党的正确领导，可以促进广大统一战

线成员理论水平、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从而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以深远的影响。影响统一战线巩固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作为统一战线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能力、榜样的力量得到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广泛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始终肩负着“带路”的重任，这就要求党以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去影响和帮助统一战线成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赢得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衷心拥护和信赖，极大地增强了党对统一战线的号召力、凝聚力。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走在前面是领导者，统一战线成员接受共产党领导，团结在党的周围，跟着共产党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长期合作共事，就势必会给统一战线成员在理论学习、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才能够适合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的步伐，从而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参政议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延安时期，李鼎铭先生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的进步，就是一个典范。李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被采纳，后经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参议会上当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此后，他开始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对《资本论》有过研究。通过学习，他掌握了不少革命的理论，逐步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他曾经说过，“中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年虽六旬，已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1942年7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来到延安，要求他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先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表示，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

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从共产党这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和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由此可见，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怀和帮助下，在与共产党合作中，李鼎铭先生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和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为团结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事实上，很多民主人士的进步和李鼎铭先生相同。梁漱溟先生也是其中一个典型。根据梁先生回忆，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期间，带去自己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奉求毛泽东指教。看了著作后，毛泽东给予了很多批评。但让他最有收获的是，这次访问结束临别时毛泽东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12]梁漱溟先生说，后来我找来读了，觉得很好，虽然有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待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过去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著作，但很不够。后来多读了一些，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便感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对共产党的理论多样批评或斥责是错误的。多读一些马列的书，还使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别是敬佩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与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不同，高明得多。李鼎铭先生和梁漱溟先生受共产党人影响而发生的转变与进步，很能说明问题。虽然他们谈的只是个人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其道理完全一样。在与共产党的合作共事中，经过岁月的磨砺，党外人士的认识都在逐步提高，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必然要求。

其二，党的正确领导，可以给统一战线成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制度化，为统一战线成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当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提高

到制度的层面建设时，标志着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参政议政的权利得到制度保障，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点和政治优势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制度不会因为个别领导人的更替或好恶而随意改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一个地方，一把手重视，统战工作就搞得不好；不重视，统战工作就无人关注，这样的情况不少见。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印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业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标志着在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化方面有了新进展。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论的更加成熟，政策更加完善，机制更加健全，运作更加规范，新时代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必将有更大的发展。

其三，党的正确领导，有助于克服一些偏见，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保证统一战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总则中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他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他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不重视

统一战线、不会做统战工作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予以严厉批评。尤其是对那些认为党外人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党外人士是一支比较麻烦的力量，党外人士是一支消极甚至是异己的力量等错误认识进行了严厉批评。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的严厉批评，对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充分肯定，让人们对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有利于统一战线自身发展壮大，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了不竭动力。

其四，党的正确领导，能够帮助民主党派发展。“民主党派能不能发展起来，这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大”，这是李维汉在1951年1月16日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讲的话。开幕词中，他重点讲到了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认为民主党派工作一年来有成绩，主要是他们内部进行了整顿，政治上同我们更加一致了。“但民主党派的组织人数同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民主党派能不能发展起来，这同共产党的关系很大。不要他们大起来，这不要我们共产党作决定，过去我们没有作过决定不让他们大起来，他们还是很小。但要让他们大起来，就需要我们共产党作决定，否则他们还是大不起来，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在政治上占压倒优势和极高威信的共产党，人们不了解民主党派，要听听共产党的意见，否则，人们不会自动参加民主党派的。因此，即使民主党派都开了会，作了发展计划，如果我们不帮助，不支持他们，还是发展不起来，所以我们要讨论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13]这次统战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就帮助民主党派发展提出了“吸收各民主党派参加各种的人们革命运动，使他们能在运动中发展成员”等具体措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党委要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支持民主党派根据各自章程规定的参政党建设目标，按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社会

主义民主、体现政治联盟特点、体现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原则，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把自身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支持民主党派加强组织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和成员教育管理工作；支持民主党派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健全各项工作机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机关建设，提升干部队伍素质，协调解决机构、编制、经费、办公场所、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等方面的问题；完善联系无党派人士的机制，为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提供必要保障；支持社会主义学院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的作用。有了这样一些规定，我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有了制度保障。

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集中说明一个道理，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是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因而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事业取得胜利时刻不能丢弃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之能够成功领导统一战线，在于三个方面做得好。一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依据中国国情提出统一战线是一大重要法宝的思想，能够正确理解党领导的实质是带路，广大党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能够勇于承认并自己纠正错误保持先进性，三点集中起来保证了党自身有充足的领导力；二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做到始终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大大增强了同盟者对党的向心力；三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同盟者能够在一切斗争中取得胜利，将党的承诺和同盟者的愿望变为现实，使同盟者看到了希望，愿意坚定跟党走，持续提升了党的凝聚力。领导力、向心力、凝聚力“三力合一”，形成了群众拥护的最大优势，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领导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三、从统一战线实质的微观层面考察，统一战线是永远不可替代的重要法宝

从微观层面论证统一战线是个重要法宝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他在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重要论断：一是“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二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战略问题”；三是“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做？应该就是争取人心了”。总书记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归结于其本质是能够解决“人心”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就应该从“人心”开始。把人心重要性讲清楚，也就把统一战线是个重要法宝的道理理解透彻了。

越是宝贵的东西，越是难得；人心难得，就是因为人心很宝贵。人心之所以宝贵，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人心是一种记忆。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凡具备记忆能力的人，无论在世的时间长短，都会把曾经所经历的一切深藏在内心深处。历史越悠久，人类积攒的记忆越丰富，启迪就越深刻，价值就越大。其二，人心是一种判断的标准。人不会仅仅满足于简单记忆，还要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梳理和判断，其标准就是人内心的认可。其三，人心是一种力量。人们所有经历的事情都会变成记忆，然后对记忆进行整理判断，区别出好坏，搞清楚真假，最后根据判断明确态度以区别对待。或赞成或反对，这时人心就表现为一种力量，当众多人心趋向一致时，就汇集成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存在于史册，更多的是直接扎根于广大老百姓的心灵深处，搬不走，删不掉，抹不去，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人心向背可以决定一个政权的命运，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人心之宝贵不可替代，决定了统一战线是重要法宝不可替代。

人心无比宝贵，人心也十分难得，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系：其一，人心不能靠科学实验去验证。科学实验，是人类解决难题的主要手段。靠

着科学实验水平的不断提高,无数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題,被伟大的科学家们一个个攻克,让很多幻想变成现实。但科学家也告诉我们,目前人类的科学实验水平,还不能把人的感情研究清楚,更不可能左右人心。古今中外无数伟大的先哲,试图回答关于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留给后人几乎数不清、读不完的经典,但仍然没有把人心说清楚。了解人心,只能靠人们在交往中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判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既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无奈。说明不涉及感情的事情都好办,凡涉及到人心的问题,解决起来难上加难。其二,人心在不断变化。大千世界在不断丰富变化,人对世界的感知也随之不断变化,人心自然也在不停地变化着。正因为人心在变化,现实中感觉到难以捉摸,人与人之间要想交心,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其三,人心会得而复失。通过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就可以把人心得而复失的现象,看得真真切切。这种现象,就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中所说的,封建统治者始终难以逾越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人心难得,最难在不可能一劳永逸,得到而不珍惜必定会失去。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做不到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一直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做到得而不失,其高招就是自始至终做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一以贯之地为老百姓做好事。

综上,我们可以从国情、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辩证关系、统一战线本质要求三个不同层面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明白了为什么是重要法宝,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贡献也就清晰了。做好争取人心的统战工作,就能够把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等于在党心和民心之间建造了

一条畅通无阻的“高速心路”,把党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条比“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更加宝贵的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拉近的是空间距离,“高速心路”拉近的是感情距离,党心与民心连接在一起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老百姓真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也是成功的真正秘诀。所以手握统一战线法宝的毛泽东自信满满地宣告:“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而且还在继续证明着毛泽东的科学论断。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5.
-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7.
-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6.
- [4][5][6][7][8][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3、603、605、614、606、613.
- [10]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2-273.
-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
- [12]梁漱溟.我生也有涯愿无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16.
- [13]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9.

责任编辑:王天海

统一战线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实体阵地探析

——以浙江省为例

许 军

摘 要:统战实体阵地指的是有固定实体场所的统战平台载体,是统战工作的独特现象,浙江省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对此项工作投入了较大力量,各种阵地具有数量众多、覆盖面广、作用全面的特点。从理论上讲,统战实体阵地为统战成员提供了心理支撑,从实践上看,它为统战工作提供了场所依托。统战实体阵地具有教育引导、联谊交友、团结凝聚、服务协调、支持激励五大功能,体现了化虚为实、化散为整、化异为同、化温为热、化流为定的理念。针对统战实体阵地的不完善、不均衡、不系统、有偏差等问题,应从优化顶层设计、坚持“统战姓统”、鼓励因地制宜、遵循效果导向等角度进一步加强统战实体阵地建设。

关键词:统一战线;思想引领;实践教育;实体阵地;浙江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0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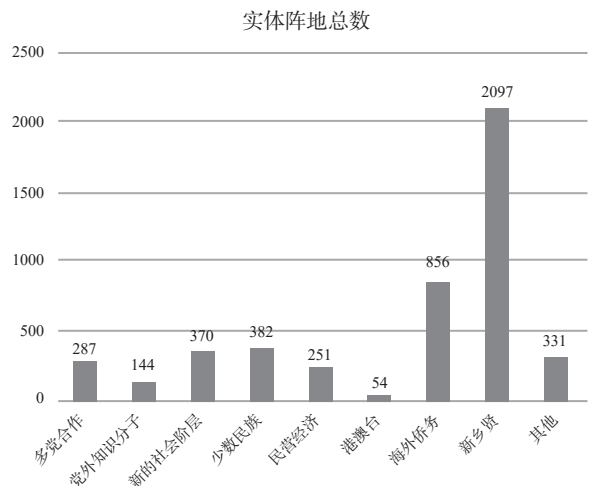
本文讨论的“统一战线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实体阵地”(以下简称“统战实体阵地”)指的是有固定实体场所且具有思想引领、团结凝聚、联谊交友、会议活动等功能的统战阵地,包括纪念馆、活动中心、统战团体活动阵地、实践创新基地、少数民族之家、商会大厦、乡贤馆等。统战实体阵地是各级党的统战工作中非常独特的现象,是开展统战工作必不可少的平台载体,为统战工作的顺利推进发挥了较大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浙江省委统战部在部领导的带领下,对全省各类统战实体阵地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摸底和分析总结。

一、浙江统战实体阵地的主要特点

收稿日期:2021-09-01

作者简介:许军,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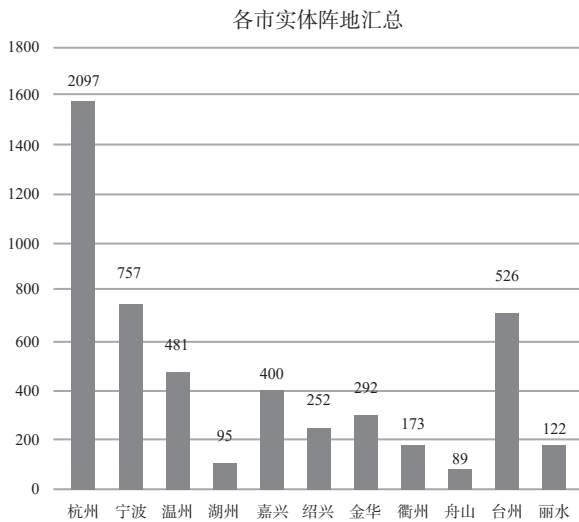
据初步统计,浙江全省统战阵地高达4772个,平均每市有统战实体阵地434个,每县区有统战实体阵地47个。



对于统战实体阵地的类别，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从地区分布上看，统战实体阵地的数量与统战工作的工作成效有密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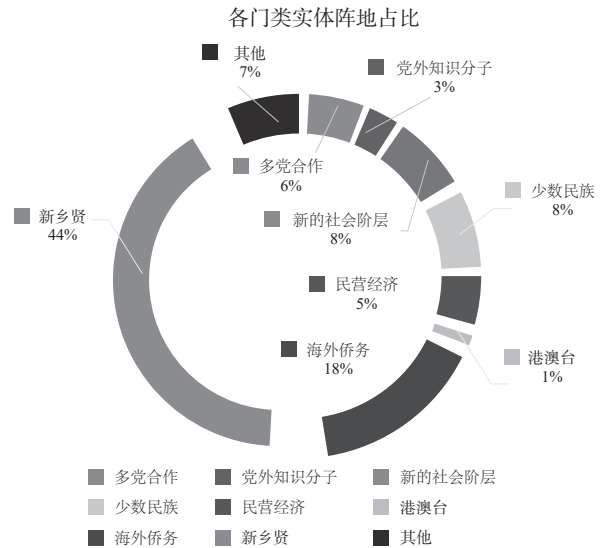
统计表明，统战工作考核成绩与统战实体阵地之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与基层统战的活跃程度成正相关关系。部分地区党委统战部对统战实体阵地建设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如台州市在全市普遍建立同心之家、乡贤馆和“侨家小院”，对名称、标志、标准作出统一规范。为做好“侨家小院”创建工作，该市黄岩区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工作网络。在区级层面成立了由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任组长的“侨家小院”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在乡镇街道层面成立由统战委员为组长、统战干事和乡镇街道侨联小组组长为成员的“侨家小院”工作领导小组，在村(社区)层面明确有创建任务的村(社区)书记或主任为“侨家小院”创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同样，该市的统战工作也走在全省前列。



(二)从工作领域上看，统战实体阵地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统战工作对象类别

举凡多党合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少数民族、民营经济、港澳台、海外侨务、新乡贤等工作领域，均有统战实体阵地，可以说实现了各领

域统战工作的“全覆盖”，这是统战工作的扎实阵地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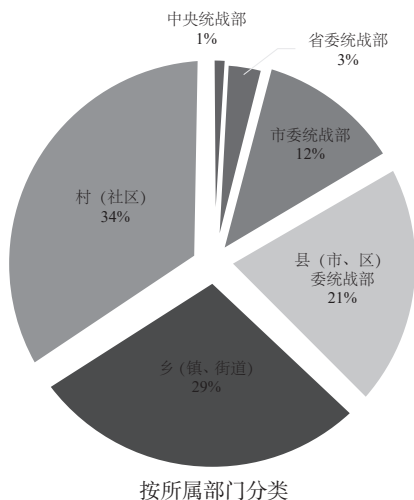
(三)从性质上看，统战实体阵地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作用

可以粗略分为展示再现类、活动联谊类、促进履职类等，而其中相当数量的阵地具有综合性功能。展示再现类阵地的主要内容是统一战线历史，如民主党派之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特色鲜明的是各地普遍存在的新乡贤阵地，主要展示本地有成就、有贡献的古贤今贤和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对当地文化建设起到良好示范激励作用。活动联谊类阵地主要目的是提供会议、活动、接待场所，比较典型的是各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阵地，为分布广、思想多元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联谊交往平台。促进履职类阵地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统战成员参政议政、调查研究和创新创业，比较典型的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商会大厦，集统战工作与企业发展于一体，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又如金华设立影视交流实践基地、电子商务实践基地、青创实践基地、医疗服务学习基地、古村落研学基地等，集促进港澳台海外统战交流联谊、创业创新于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统战实体阵地中，以“XX之家”形式命名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同心之家、民主党派之家、少数民族之家、侨胞之家等，这表明，统战实体阵

地设立较多地考虑到为“党外人士之家”的理念，其本质是为统战成员提供心理维系、心灵归宿，为统战成员搭建实物化的精神家园。

（四）从设立或管理层级上看，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都对统战实体阵地有所关注和投入

全省统战实体阵地设立主体有省、市、县、乡、村五级，分级管理的各类阵地分别为各级统战成员的活动提供了良好载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部分阵地被中央统战部门纳入视野，被评为全国性的平台载体。同时，对于统战实体阵地，虽然设立部门主要集中于基层市、县、乡三级，但是，从上到下的各级统战部门都对这项工作高度关注，部分阵地属于不同层级的统战部门共同管理使用，表明统战部门上下同欲、纵向联动的良好态势。



二、统战实体阵地发挥作用的路径与方式

总体来看，统战实体阵地有以下 5 个功能：

（一）教育引导功能：以思想政治引领为宗旨

浙江省各地统战实体阵地把思想政治引领放在首位，其做法主要是以阵地为平台，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党建引领，举办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强化学习平台建设，用理论武装头脑、定向领航、指导实践。如建成面积达 3500 平方米的世界温州人博物馆，全面展示温州人历史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贡献，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对海内外温州人起到了良好的教育引导

作用。

（二）联谊交友功能：为统战成员提供场所依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主党派之家等统战实体阵地以促进统战成员之间的联络互动、沟通团结为重要目标，通过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把各类统战成员团结起来。舟山市各民主党派之家设有展示厅、会议室、图书室等，是民主党派成员重要的活动场所，不但为各民主党派成员履职提供便利，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学习、召开会议、开展活动的场所，成员们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碰撞思想，联谊交友，是民主党派成员的“家”。

（三）团结凝聚功能：把党外代表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各地把统战实体阵地作为团结更多统战领域、更多统战对象的重要平台，普遍建立起联络组织，并开展特色活动，有效聚集起一批富有正能量和感召力的统战成员。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统战资源在这里汇聚；分散的基层统战组织和统战成员在这里互动，实现资源互补、各取所需；统战各条线、各领域的工作任务在这里对接，实现真正落地；通过开展团结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不断巩固新时代统一战线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

（四）服务协调功能：促进统战成员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各地统战实体阵地多措并举发挥阵地的服务功能，加强与统战成员的沟通联系，帮助协调解决问题，用真心服务、真诚关心，营造统一战线大家庭的温暖氛围；注重提升服务能力，提升统战工作队伍综合素质，注重利用新技术新媒体，结合各领域成员需求建立更多服务载体；进一步完善服务理念，服务全局工作，围绕中心多作贡献，推动统战事业实现更好发展。众多“少数民族之家”强化服务理念，创新社会化治理模式，开展公益活动、文化宣传、矛盾调解，努力实现

民族工作共治共融。各地“民主党派之家”积极为民主党派高效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华侨服务中心”等大力加强对新侨回国创新创业的引导，开展维权保障服务。

（五）支持激励功能：促进统战成员创新创业、投身社会发展

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民营经济人士有关的统战实体阵地在支持激励统战成员创新创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路桥区积极推进香港青年产业园建设，持续深化香港青年统战工作，园区占地面积245亩，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融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为一体，成为路港两地青年创新创业的热土，打造了香港青年的创业平台。再如平湖市“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位于平湖城区核心位置的总商会大厦内，大厦建筑面积十九余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商会大厦，目前共入驻企业220余家，其中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40家。玉环市亿工场构建“五位一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家，既是“凝心聚力之家”，也是“成长成才之家”“创新创业之家”“温暖温馨之家”。

三、统战实体阵地发挥作用的逻辑与理念

实体阵地在统战工作中的必要性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从理论角度考察：环境影响心理

与党委政府其他类工作相比，一方面，统战工作的对象是人的思想政治观念，另一方面，成员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流动性、复杂性。简言之，统战工作具有“虚化”和“无序化”的天然属性。因此，统战工作应该克服的重要困难就是化虚为实、变无序为有序。一般而论，解决的途径有两个，其一是建立组织，使统战成员具有组织的归属感，具有指向群体的心灵依托，其二即是工作过程的具体化、实物化。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只有在与环境适当互动时才能生存，人类必须学习认清在环境中，所遭遇之不同物体的价值及其方位，由过去的经验中建构出环境的影像，然

后又唤起和检验这些影像以计划眼前。这不只协助我们在环境中移动，而且深深地影响我们在环境中的情感经验，以及离开之后所能回想起的讯息。个人是知觉系统的一部分，在知觉历程中有时很难将个人与环境分离，而且知觉是由个人在环境中所做的事所决定。环境可以刺激感官，提供个人多于其所能有效处理的讯息，环境认知是有机生命体得以在各地通行的基础，环境讯息被保留在大脑的记忆中并随着时间不断修正，从而对个人行为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从统战的角度看，统战建筑、统战场所、统战地点、统战场景会对统战成员形成印象深刻的记忆，对统战成员的心理、情感、精神、意志、思想、信仰等各个层面起到全方位的作用，统战实体阵地中的各种统战活动及其氛围会极大调动统战成员的积极性，使思想政治引导、联谊交友、团结凝聚等一系列活动的效果得以巩固和放大，使统战工作事半功倍。因此，实体阵地的建立是必然的。

（二）从实践角度考察：场所影响效果

长期以来，场所始终深刻影响着统战工作的实效。从正面看，民主党派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民营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相对成功有效，除了因为它们有固定成熟的组织，同时也因为它们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从反面看，某些领域的工作效果相对较弱，也是因为其组织建设特别是实体阵地建设的相对缺乏。比较典型的是港澳台海外、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一方面，这些领域工作具有庞大的成员数量、广泛的空间分布、复杂多样的成员身份构成，使组织起来、活动起来、作用发挥出来的工作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固定活动场所的欠缺使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浙江省各地工作表明，虽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组织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工作场所的欠缺给各种活动的开展造成较大困难，不少统战联谊交心活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积极性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处于抽象甚至缥缈

的状态，代表人士对组织的归属感并没有预期的强。从港澳台海外工作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的华侨回国后参加各种活动，在没有设立实体阵地的情况下，基本上在统战部门自身办公的会议室、会客厅、统战成员的家中以及旅馆、餐馆等地进行，这些场所具有临时性、娱乐性、随意性的缺点，无法形成对统战成员的吸引力，统战组织对统战成员的凝聚力、影响力、吸引力均大打折扣。因此，实体阵地的建立是必然的。

从统战实体阵地发挥作用的情况看，它对统战工作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以下理念：

1. 化虚为实

在工作方式上，化虚为实有三方面的内涵：

其一是将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实体化，如各类展览馆、纪念馆、史料陈列馆之类，以图片和多媒体的方式，将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历史再现出来，提升史料和人物的感染力和教育作用。典型的是嘉兴的“同心圆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历程”专题展览以及沈钧儒纪念馆、褚辅成史料陈列室等，具有形象直观、现实生动、代入感强的独特优势，更能打动人、更能深入人心。

其二是联谊交友工作实体化，如各地的民主党派活动中心、民主党派之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家等，为联谊交友、开展活动提供了良好场所，统战成员从无阵地的空中交流、流动交流变成面对面交流，精神体验更为切实有效。

其三是体现统战工作服务当地党委政府中心任务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思想政治引领和团结凝聚的最终目的是把统战成员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为党的事业作出实际贡献。以象山影视城“影视象新力”基地等为代表的各类阵地不但促进了统战成员的参政议政，而且大大促进当地影视业的繁荣发展。

2. 化散为整

在工作路径上，化散为整主要体现为：

其一是将散布于社会各个方面的统战成员集

聚起来。对分布于各行业、各单位、各地区的统战成员来说，除了频次较低的会议之外，统战实体阵地才是集聚的最佳途径。

其二是将统一战线各个领域的统战成员集聚起来。乡贤馆等阵地则把不同政治身份、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以及海内外同胞等各类统战成员集中起来，形成了各方面成员的大团结大联合局面。再如丽水市的龙泉剑瓷新力量实践创新基地、畲族文化空间工作站暨新联会创新实践基地等若干统战实体阵地，既有弘扬当地文化、助力当地发展的目的，也有统战工作的意义。

其三是将统战工作的各项功能集聚起来。统战实体阵地的功能作用不是单一的，大多具有综合性，温州人之家、平湖市民营经济人士之家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实体阵地集服务企业、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引导企业家发挥精准扶贫作用等功能于一体。世界温州人家园总建筑面积 5 万多平方米，包含世界温州人博物馆、温州招商展示中心、世界温州人云社区等 15 个子项目，具有主题展示、联络联谊、创享服务、回归示范等功能，该阵地建成后，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人回乡后即可于此相聚联谊，不完全统计，已开展各类活动 600 多场次，接待兄弟统战部门、异地温州商会、海外华侨侨团等回访 5 万余人次，对团结凝聚全球温州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3. 化异为同

在工作目标上，在统战实体阵地的平台上，求同存异、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理念得以充分体现。通过联谊交友、思想交锋、研讨交流，统战成员在思想政治上更趋一致，服务中心大局的追求更趋一致。宁波等地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以“同心”思想、“同心”教育、“同心”宣传、“同心”实践、“同心”发展为理念，将认识各异的青年网络“大V”、网宣员、论坛负责人、“网红”主播等青年新媒体从业人员真正“聚”起来，为构建清朗的舆论空间发挥积极作用。

4. 化温为热

从工作活力上看,统战实体阵地的建立为统战工作的开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很多联谊交友、政治引导热度得以大幅度提升,统战活动温而不火、时有时无的局面得以改变。杭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体阵地“同心荟”建立后,党务、政务、商务工作得以有机结合,组织更有活力,活动更有影响,有的基地创业大赛、楼宇篮球赛、律师争霸赛全年活动达到300余场,发现、引领了一大批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实现了思想引领、团结凝聚。

5. 化“流”为“定”

从工作方式上看,统战实体阵地的建立为统战部门开展工作和统战成员开展活动提供了固定的场所,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和侨务工作方面,随意性、随机性、临时性、流动性的工作局面得以改变。杭州市华侨活动中心大楼自2014年启用以来,侨界群众实现了活动有场所、联谊有平台、娱乐有设施,侨界人士有奔头、有归宿、有亲切感,因之“愿意来、待得住、有收获”,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引资引智等工作也热度大增,中心成为促进人文气息浓郁、文化底蕴深厚、饱含桑梓情深的“侨胞之家”。

6. 化浅为深

从工作力度上看,统战实体阵地的建立使统战工作由原来的浮于表面、粗枝大叶甚至形式主义问题得以改变,思想政治引导更加深入细致、触及灵魂,对统战成员的常态化团结联谊更加紧密坚固,统战工作的影响力、针对性也明显增强。温州市海外传播中心建立后,努力打造以温州市海外传播中心为“圆心”的海外传播阵地,通过全面集聚包括海内外鹿城人、国际志愿者在内致力于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民间力量,打造队伍和宣传矩阵,以社交化、可视化、移动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海外宣传实效大幅提升,为侨服务更加顺畅。

四、统战实体阵地建设的局限与困境

在取得进展的同时,浙江各地统战实体阵地

建设的短板和问题也有不少。

(一) 统战实体阵地的意义和作用远未得到足够重视

虽然浙江各地统战实体阵地数量不少,有的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总体来看,统战实体阵地建设仍然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各级党委政府对统战实体阵地作为统战工作抓手和平台的巨大意义和作用的认识还不到位。其结果是,对统战实体阵地建设的投入还很小,很多阵地建设都是统战部门在单打独斗。在市、县、乡三级,资金投入不足、活动阵地不稳、工作人员不足、使用频率不高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阵地由统战成员无偿提供,一些阵地产权不清晰,一些阵地因人手不够而经常闲置。即便在省级层面,浙江省欧美同学会等阵地也有着人手不足、使用率不高等问题。同时,一些统战干部运用实体阵地开展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活动的能力和意识还有所欠缺,导致部分阵地“空有其表”。

(二) 部分统战实体阵地的工作目标有所偏差

一些统战实体阵地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未能把握统战工作本质,未能将强化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作为统战实体阵地最重要的两个目标功能,有的阵地的活动娱乐功能、接待交友功能、招商引资功能、创新创业功能发挥比较充分,但思想引导功能、教育培训功能弱化。现实中,部分统战团体没能把握实体阵地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明确阵地的宗旨和目标,有的甚至为了建阵地而建阵地,使得一些实体阵地不仅不能引起基层党委政府的重视,而且也不能受到统战成员和群众的欢迎。有的实体阵地仅仅简单地安排领导参观或作为“摆设”,而未在阵地的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功能上多下功夫,未能有目标、有效果、有评估地开展有关活动,真正把实体阵地的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作用发挥出来。

(三) 部分统战实体阵地的作用发挥差距较大

总体来看,很大比例的实体阵地利用率不高,活动参与率不高,活动成效不明显,因本职工作

冲突和统战活动的吸引力不够，很多统战成员在参加各项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上都很难保证。据调查，为了避开与工作时间的冲突，现在多数实体阵地将活动开展放在周末，但周末又是一些统战成员需要休息和身心调整的时间，往往难以确保实效。另外，部分实体阵地没有建立健全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活动的长效机制，“临时性”“突发性”活动较多，且缺乏策划部署，形式单一，既对统战成员缺乏吸引力，又在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上缺乏长效性。因此，统战实体阵地发挥思想引领和实践教育作用还有差距，全体统战成员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和强化自身能力素质的目标未能达到。

（四）统战实体阵地建设不均衡

统战实体阵地主要集中于基层，设立主体以县级为主，市级偏少，省级更少，只有寥寥数家，这种“上冷下热”的阵地建设现状与统战工作“上热下冷”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在地区对比上，从浙江全省来看，统战工作基础扎实的地区统战实体阵地较多，涉及的统战工作领域也比较全面，如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地，统战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统战工作实体阵地建设欠缺明显。从统战工作条线或统战成员上看，不同条线或对象所对应的实体阵地的比例也是有明显差距的，例如，全省新乡贤类实体阵地最多占比约 44%，民主党派类阵地占比约 6%，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体阵地占比约 11%，海外侨务类阵地占比约 18%，民族宗教类阵地占比约 8%，其他阵地占比约 7%，差别比较明显。虽然各领域统战工作对实体阵地的要求不尽相同，但统战实体阵地的不均衡不利于统战工作的同步发展。

（五）统战实体阵地建设不系统

总体来看，全省大部分统战实体阵地处于独立运作状态，不但省、市、县、乡、村五级在建设阵地过程中缺少统一规划、统一部署，而且各领域统战工作在阵地建设上也缺少统一要求、统

一设计，阵地的名称五花八门，未能形成统一标志，不利于扩大统战工作的影响。统战实体阵地的标准化建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一些阵地建设的随意性较强，稳定性也有差距，阵地开展活动也缺少统一的机制和规范。阵地间的资源整合和联动示范，没有形成“大统战、大格局、大阵地的理想局面。

五、推动统战实体阵地建设的若干构想

本文认为，统战实体阵地建设既是既有的统战现象，也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创新点，对这种现象积极引导、主动推进，必能为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气象。

（一）优化顶层设计，形成统战实体阵地规范化建设

统战实体阵地建设应该受到上级党委和统战部门的高度重视，应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丰富统战工作平台载体、提高统战工作活力实效出发，坚持“大统战、大格局、大阵地的”，实现资源聚集和优势互补，变“单打独奏”为“团体协作”。一方面要加强规范化建设，适时出台专门文件，细化规范标准，完善工作制度，建立长效机制，对阵地的名称、标志、配置、制度等作出统一规定，争取做到“有活动场所、有办公设施、有文化展示、有规章制度、有专人负责”，形成统战实体阵地的品牌形象。要建立健全学习、联系选民、信访接待、调研视察检查、述职评议、履职考核等制度，做到以制度促管理、以管理促效率，使各项管理符合规定和要求。另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从政治高度出发积极为各级统战实体阵地建设提供场所、资金、人员支持，将实体阵地建设列入专项经费，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将公用设施、闲置场所划拨给统战部门作为统战成员固定活动场所，鼓励多馆合并共用，积极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二）坚持“统战姓统”，切实发挥统战实体阵地的凝聚思想与实践教育的作用

统战实体阵地建设必须突出政治性，融入统战元素，依靠各级党组织来开展工作，坚持大

党建统领大服务，切实加强党委对统战实体阵地的领导，发挥统战干部和统战成员的引导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统战成员，全力加强对统战成员的团结凝聚、教育引导。要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宣扬统战文化理念，掌握好统战工作的艺术性，不断增强实体阵地的思想引领力。统战实体阵地建设要加强与组织、宣传等部门及群团组织、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协作配合，发挥好领导小组作用，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举措，形成合力推动阵地建设的良好格局。

（三）鼓励因地制宜，形成统战实体阵地的品牌和特色

各地党委和统战部门应当坚持需求导向，立足当地统战资源、文化资源、物质资源，挖掘统战元素，努力创新设计，提升品牌意识，体现本地特色。在符合基本规范和标准的基础之上，统战实体阵地应当紧扣统战工作需要，贴近统战成员需求，各有侧重，有的放矢。积极引导阵地建设上融入文化内涵，结合本地地域特色，将历史名人、民间故事、文化传承等乡土元素融合到阵地中来，使统战实体阵地最大限度地传承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要创新实体阵地服务方式。阵地场馆体现多功能性，融教室、活动中心、休闲、直播间、对外开放和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空间布置相对灵活。创新阵地方案，助力资源、平台共建，提高数字化运营管理能力，提升服务内涵，以信

息化建设为依托，更好地服务统战成员，提高阵地系统性。充分发挥基地的平台渠道优势，打造教育实践干事创业的平台，增加贴地气、为民众所认同的动态展示。

（四）遵循效果导向，提高统战实体阵地的综合功能

要拓展统战实体阵地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从过去“小视野、小统战”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大视野、大统战”上来。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开展团结凝聚工作的同时，要坚持融合中心工作建设阵地，兼顾凝聚共识人心与汇聚智慧力量，广泛发动各级统战组织利用实体阵地，带头开展学习教育、实践锻炼、联谊交友等活动，提高统战实体阵地使用频次，发挥阵地的整体功能、综合功能，扩大实体阵地影响力。在运营模式上，要破除僵化思维，灵活体制机制，鼓励走市场化运营模式，鼓励作为公益化等场所的阵地，经常性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多馆合一，共建共享，提高场馆利用率。对阵地要充分利用，拓展功能，提升内涵，充分宣传好、利用好、发挥好统战实体阵地的作用，尤其注重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把它变成丰富统战文化和活跃统战群体的一个重要载体。要将各类统战实体阵地串珠成链，形成阵地网格，打破特定阵地仅仅满足特定统战对象的局限，通过阵地共用、活动共享等方式，分层分类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需求和功能，实现一个阵地多种功能。

责任编辑：鲍跃华

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 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中的困境及创新研究

吉 强

摘 要:新发展阶段需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驾护航。由于互联网“最大变量”的深刻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一个重点。近年来,统战工作愈发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但是在“谁来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等层面存在着实践困境。这需要统战工作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通过打造覆盖广泛、多元、多层的传播队伍,推进内容的宣传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统一,构建勾连圈层的统战传播网等方式加以应对,为维护新发展阶段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统战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22-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1]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意识形态领域使命任务更加艰巨,阶段性特征更加显著,阶段性挑战更加突出”^[2]。“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另一方面,离开了有效传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发展、延伸和成功。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以其自身逻辑不断重建传播秩序和传

播规则,深刻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4]一旦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阵地失守,势必引起线上线下各领域的连锁反应,最终会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新发展阶段,要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强的政治保障。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高度契合。近年来,统战工作愈发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进行“互联网+统战”的实践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统战工作在“谁来传

收稿日期:2021-10-20

作者简介:吉强,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四级调研员。

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等层面均存在着困境，影响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效能。因此，在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需要进一步顺应网络传播规律，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在传播主体、内容、路径等方面加强实践创新，为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一、“谁来传播”层面：网络传播中心的流动性导致选人、用人困境

网络传播格局是一种流动性的“多中心化”格局。这使得统战工作在打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心时，面临着选准人、用好人的难题。

（一）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多中心化”格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赋予了网络用户传播权，导致“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打造“我的传媒”。由此，传播的基本单位不再限定于专业化的传媒机构层面，而是体现在传播“个体”（包括个人、组织、商业平台和专业传媒机构等）层面。每一个传播“个体”都以节点的形式存在于整个传播生态之中，体现出传播扁平化的特征。在此情形下，众多的传播“个体”形成了广泛的竞争态势，客观上会分流其他传播“个体”的资源，从而瓦解以往金字塔般的“中心化”传播格局，形成“去中心化”趋势。

另一方面，“人人都有麦克风”并非人人都有相同的“音量”。不同传播“个体”在传播资源、能力、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强弱之分。其中的强势传播“个体”在“去中心化”的趋势中又有了成为“中心”的可能，这便导致“再中心化”趋势。“去中心化”趋势会干扰传播“个体”中心化的种种操作，同时给传播中心寻求垄断性地位制造障碍，削弱“一家为大”的格局。而“再中心化”趋势则保留了“中心”与“非中心”的“层级”性结构，使得传播中心依然存在。两种趋势并存且相互影响，在宏观层面便形成了“多中心化”的传播格局。

建立在“人人传播”之上的“多”中心，并非单纯体现为数量上的“多”，更是体现在来源或

性质的多样多元。在“多中心化”传播格局中，传播中心包括了个人和组织（机构），涵盖了体制内外。其中，既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心，也有倾向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心。

（二）传播中心具有流动性特征

除依靠技术赋权之外，一个传播“个体”能否成为传播中心，其中心地位是否可以得到维持或加强，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身能力，即传播“个体”的主观性因素（包括传播意愿、传播观念与思维等）和客观性因素（包括社会地位、传播资源、传播技能等）。二是官方赋权，主要体现为官方给予的政策、物质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用户资源，当用户与传播“个体”具有黏性（体现在用户对传播内容的关注、转发和评论等方面），尤其是愿意向传播“个体”让渡自身的话语权时，用户才可被视为有效的用户资源。用户资源是传播“个体”能否成为“中心”并维持中心地位的关键。四是不同传播中心之间相互合作或竞争的状态。

上述因素，特别是用户资源和“中心”间合作或竞争状态，往往复杂、变动而不确定。这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传播中心的不稳定性，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传播中心的流动性——不断有新的传播中心产生，也不断有传播中心被“去中心化”。

（三）打造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心的选人、用人难度增加

统战工作主要是做代表人士的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使统战工作对象成为传播中心，发挥“意见领袖”影响一片的作用。在发现而选择、培养而发挥作用等环节，都力求“中心”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但是，网络传播中心流动性特征首先带来了“找谁”的难题。例如，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即使运用大数据等网络手段筛查，通过线下“人找人”等方式推荐，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找人难”的问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播中心的流

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用人、发挥好作用环节，网络用户资源状况、不同“中心”间的竞争状况等因素，将导致统战网络传播中心存在不稳定性。例如，一个网络“大V”可能因为一些言论或一件事而“人设”崩溃，瞬间失去影响力。

二、“传播什么”层面：网络信息的繁杂性、碎片化、娱乐化、传播智能化导致传播内容生产困境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网络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信息的繁杂性、碎片化、娱乐化和传播智能化。这种“四化”传播环境对统战工作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造成冲击。

（一）网络信息繁杂性分散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注意力

网络信息的繁杂性是现实社会复杂异质性与网络“人人传播”叠加的必然结果。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相互交织。国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5]。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诋毁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各种消极情绪夹杂着西方价值观念，不断通过网络加大对国内的输入和渗透。在国内，改革和发展必会引发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诸多方面的新变化，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取向更加多元、不同社会思潮此起彼伏。源于现实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流行文化，在“人人传播”的网络生产中以不同形式、不同面目不断涌现，产生巨量复杂多元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分散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注意力。

（二）网络信息碎片化影响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

网络生产出巨量信息，但用户注意力却有限度，信息的“无限”与注意力的“有限”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网络传播终端的移动化、小型化改变了用户接触信息的习惯，用户通常在碎片化的时间里生产或消费信息，信息碎片化传

播成为一种常态。在碎片化传播中，完整或宏大的叙事不易被认可，任何主题、任何事实都可以被拆解为不同“零件”，因此，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易出现零散化、片面化现象。另一方面，网络用户并非完全停留在碎片化理解的层面，他们会根据自己或所属群体的认知、情感、立场及观点，在不同平台、不同文本中有选择地截取各种碎片，再“把各个碎片结合起来，创造出意料之外的故事情节，然后通过增加新的细节来完善叙事的完整性，最后在这些碎片之间建立一致的因果关系”^[6]，从而拼贴出每个人“自以为是”的“完整”图景。在信息的分享和多次传播中，经过不同用户的层层拼贴，最初的叙事可能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上述现象易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规则和话语体系被解构，意识形态内容被拆解、被重构，难免会使网络用户在接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三）网络信息娱乐化易降低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娱乐是人获取外界信息时的一种客观需求。但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信息的娱乐功效被无限放大，出现了一切皆可娱乐、一切皆为娱乐的异化现象，即信息的娱乐化倾向。现实中，为了吸引流量，获取经济利益，恶搞、煽情、“虚无”、审丑、嘲讽乃至制造争议性话题时时可见。信息娱乐化难免造成低俗、庸俗、媚俗导向，冲击社会公序良俗，弱化网络用户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更危险的是，各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往往借助信息娱乐化这一隐蔽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网络用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最终导致网络用户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降低。

（四）网络信息传播智能化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隐患

以算法推荐内容为特征的信息传播智能化已经出现。算法推荐的技术本质是“对资讯和人的精准匹配，平台媒体通过广泛抓取各种内容源生产的内容来聚合资讯，再借助大数据的用户‘画

像’分析来向用户推送符合其兴趣或需求偏好的特定信息，且通过机器学习或算法改进逐步深化对用户的洞察，持续提升分发的精准性”^[7]。其中，用户的需求偏好是算法的逻辑起点。算法推动了“满足需求偏好——强化需求偏好”的不断循环，形成了算法与用户需求偏好的紧密互动。

当前，在算法技术发展及运用领域，商业平台处于优势地位。它们成为“当下信息集成、流动、分发和传播的‘枢纽’，而传统纸媒、电台或电视台，越来越成为边缘化的信息传播载体”^[8]。当商业平台把持算法技术时，商业平台算法与用户需求偏好的互动将会发挥“把关”作用，并将逐步成为信息智能化传播环境中的基础性“把关”环节，这种互动将左右内容选择和信息传播流向。在此情形下，算法与用户需求偏好的互动一旦偏离“正道”，必将导致社会思想观念层面的偏向，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隐患。

（五）“四化”环境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四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9]。统战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需着重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生产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其中，传播力是对内容的编码能力，引导力是在内容方面的议题设置能力，影响力是使内容引起关注、激发共鸣的能力，公信力是让内容获得普遍信任的能力。“四力”相互作用、密切关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效能。

但是，网络信息繁杂性导致的注意力分散、碎片化带来的理解偏差、娱乐化引发的认同降低、智能化产生的安全隐患，这四者相互交织叠加，对统战工作提高内容生产的“四力”不断造成冲击，会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怎么传播”层面：网络传播结构的“圈层化”导致传播路径上的困境

当互联网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结构

趋于“圈层化”。“圈层化”导致异质圈层相互区隔、同质圈层相互勾连，其负效应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范围扩散、深层次渗透造成较大障碍。另一方面，受传统传播思维、方式等因素影响，统战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上，存在适应“圈层化”结构的滞后性。

（一）网络传播结构趋于“圈层化”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因此，社会交往是人的固有的内在需求。现实中，人们基于社会分层，依据血缘、地缘、业缘等交往需求形成了各种线下社交圈层。社交媒体的盛行不仅促使各种线下社交圈层延伸至线上，也产生了形形色色、数量众多的线上新的社交圈层。同时，互联网技术发展不断催生新的传播平台。由于网络用户在使用平台时存在“人以群分”现象，多样化的平台便导致了平台性圈层，使得网络圈层糅合了社交和平台两个维度。

另一方面，网络用户总是处于一定的圈层中。他们往往在圈层内进行着信息的生产与分享，并通过圈层间的链接，推动信息“出圈”流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等各种传播方式均内嵌了圈层要素。因此，网络传播由“点到面”的单向线性结构演化为“圈层化”结构。

（二）“圈层化”负效应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制造障碍

“圈层化”结构包含了两个维度：异质性圈层区隔和同质性圈层勾连，其负面效应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传播制造了障碍。

异质性圈层区隔的负效应——阻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在现实社会中，个人掌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存在着差异，而所具有的血缘、地缘、业缘也被固定在条块分割的物理空间中，这必然导致不同圈层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在保留各种现实圈层差异性的同时，又不断再构出基于平台和“趣缘”的差异化圈层。每个圈层都会成为相对稳定的“价值共识圈”，产生自我把

关的信息过滤机制。内部一旦产生“群体极化”倾向，圈层便会变成一个“信息茧房”。此时，圈外不同声音会被拒斥、屏蔽，造成异质性圈层间的相互区隔。其负效应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息流在异质性圈层间易被阻断。

同质性圈层间勾连的负效应——放大“杂音”。在异质性圈层相互区隔的同时，同质性圈层却容易产生勾连。形形色色碎片化地分散、沉淀在各种圈层中的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借助同质性圈层的勾连在更大空间流动，甚至产生“病毒式”的传播效果。一旦如此，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便会整合放大，甚至变为“主流”，容易增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博弈的能力。

(三)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尚不能适应“圈层化”结构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统战工作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路径方面尚未更好适应“圈层化”结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统战官方网络传播阵地未能嵌入更多的网络平台。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兴平台不断涌现。例如，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催生了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內容分发平台，并将提升此类平台的“头部”性。又如，随着 5G 的普及，将会出现一种趋势——“社会主要交流手段将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短视频与中长视频将成为 5G 时代人机传播内容最主要的表达方式”^[11]，视频分享平台将更加流行。在多平台的背景下，统战部门在内容分发、视频分享等平台上用力不足。

二是“关系传播”不够充分。当前的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不再以信息的内容为导向，转而以受传者之间的关系为导向”^[12]，“关系会影响讯息的传递方式和对意义的理解”^[13]。网络传播体现出“关系传播”的属性。由此，人与人的互联，即关系互联已成为网络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尽管目前统战工作注重社交媒体传播，但在技术运用、内容生产与分发等各环节，不同程度存在

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递”思维，具有“点到面”的线性传播痕迹。同时，统战传播主体与目标用户的关系互动不畅，缺乏有效的“关系”互连，用户黏性不足，因而缺乏必要的“关系传播”资源，这些又易加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圈层化”结构中的传播困境。

四、新发展阶段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创新策略

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在现有实践成效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思维，并针对各种困境，在传播队伍、内容生产、传播路径等方面继续创新，以此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更好地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一)强化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针对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的深刻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14]，因此，统战工作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首先要强化互联网思维。这需要把握四个维度的互联网观。

一是网络规律维度的互联互通观——“网络的本质在于互联，信息的价值在于互通”^[15]。互联互通观是互联网规律的集中体现。互联网的互联是“物—信息—人”多维多层多向交互的跨界互联，其中，信息互通是互联网互联的核心所在。一切互联均是以信息为媒介、以信息为内容，均是建立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上。缺少硬件设备的互联、人的互联，信息流动难以畅通，而缺少信息的互通，设备、人及其他要素的互联将丧失存在的意义。可以说，网络互联与信息互通互为条件而融于一体，构成了互联网的内在基因。

二是工作空间维度的网上网下一体观——网上与网下互交互嵌为一体。网络空间并非网下空间的“原生态”映射，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不同于网下空间的新环境，并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同时，“网络空间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各个地方之间的通道”^[16]，它与网下空间互联、互动而互融，共同

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工作空间。

三是工作对象维度的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互联网虽然是无形的，但运用互联网的人们都是有形的”^[17]，人具有线上线下的双重性。虚拟人现实人统一观是网上网下一体观的逻辑延伸，即人在什么样的空间会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在什么样的空间针对人的什么样特性开展工作。

四是工作本领维度的学网懂网用网观——“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18]。面对互联网新技术的迭代更新，需要不断熟悉、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好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上述四个维度的互联网观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统一于“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要求，共同构成了统战工作的互联网思维。

（二）打造覆盖广泛、多元、多层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队伍

在互联网技术逻辑的作用下，网络传播“多中心化”的流动性特征将会持续存在。解决其带来的“找人难”、传播中心作用不稳定等问题，需从“人人传播”中的传播节点层面寻找对策。

“根据罗伯特·梅特卡夫定律（Robert Metcalfe's Law），一个网络的有用性或者效用等于使用者数量的平方。”^[19]按照这一定律，传播节点越多，网络意识形态整体传播效用越高。因此，打造覆盖广泛、多元、多层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队伍，可以一定程度化解网络传播中心流动性的困扰。

一是全面打造统战工作者网络传播队伍，形成人人都能传播、人人都会传播的局面，不断提升统战工作者直接面向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开展线上互动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充实统战工作对象网络传播队伍。针对“人人传播”“多中心化”“圈层化”等网络传播特点，基于统一战线各个领域，广泛选择传播主体。传播主体要涵盖体制内外、来自不同社会

圈层，包括传统工作对象和新的工作对象群体。在上述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专业特长、传播技能及资源，按照“用户生产内容”“专业生产内容”“职业生产内容”的差异，培育涉及不同社会领域、不同类型的网络“大V”“中V”和“小V”。

（三）推动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的宣传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统一

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20]，而“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求、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21]。这反映在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中，便涉及到内容生产的两个导向的关系——统战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宣传导向和目标用户“想看什么”的需求导向的关系。只有实现宣传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统一，才能破解网络信息“四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统战工作史，进一步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统一战线故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善用大数据手段掌握网络用户特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由此精准分析网络用户的共性和个性需求，从中找准思想的共振点、情感的共鸣点和利益的交汇点。在此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三贴近”，把握“时、度、效”，不断增强内容的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努力做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同时，适应分众化、碎片化传播特征和用户的新媒体使用习惯，在内容表现形式上不断创新。

（四）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战传播网

要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更大的网络空间范

围传播,就必须打破异质圈层间的区隔,形成穿透力强的传播路径。这要从网络圈层的平台维度和社交维度着力,构建一张可以勾连不同异质圈层的统战传播网。

加快推进全方位立体化的统战网络传播平台建设。从功能方面看,不仅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官方综合信息传播平台建设,还要着眼于统战工作对象,不断打造政治立场坚定、传播能力较强的个人或组织化的自媒体平台,让这些自媒体平台承担不同类型的传播任务。从技术方面看,统战传播平台,尤其是官方平台要积极在“今日头条”等内容分发领域和“抖音”等视频领域增加覆盖密度。通过这两方面的协同,形成功能定位多元、载体多样的统战网络传播平台集群,为构建统战传播网提供物质载体。同时,依据互联网的互联规律,加快对人的“关系”互联。在打造统战传播队伍时,通过创造各种“跨界”的线上线下关系链接,把区隔在不同社会空间、不同社交群体内的统战传播主体互联为整体性“关系大网”。

在上述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以统战网络平台群为支撑,以统战传播主体间“关系”互联为管道的传播网,让网内的不同统战传播主体嵌入相应的平台和社交圈层,再以统战传播主体间的“关系”互联打通这些平台和社交圈层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统战传播网对圈层的广泛勾连。由此,发挥统战传播网的双重引流作用——把统战传播平台的信息流引入各个平台或圈层,把不同平台或圈层的人流引入统战传播平台——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对于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壮大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促使灰色地带向红色转化,统战传播网将能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EB/OL]. (2021-04-3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4/30/c_1127390013.htm.

- [2] 贾立政. 关于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使命的思考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 (24): 2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0.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42.
- [5]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EB/OL]. (2021-04-3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1-04/30/c_1127390013.htm.
- [6] 范明. 论互联网群体叙事的意义流动 [J]. 现代传播, 2021(4): 156.
- [7] 张志安, 汤敏. 论算法推荐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10): 176.
- [8] 张志安, 曾励. 媒体融合再观察: 媒体平台化和平台媒体化 [J]. 新闻与写作, 2018 (8): 88.
- [9]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EB/OL]. (2016-02-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9/c_1118102868.htm.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 [11] 喻国明, 杨雅. 5G 时代: 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 (1): 7.
- [12] 陈先红, 潘飞. 基于社会网理论的博客影响力测量 [J]. 现代传播, 2009(1): 118.
- [13] 王怡红. 关系传播理论的逻辑解释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6 (2): 21.
- [14][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08、308-309.
- [15][17] 习近平.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EB/OL]. (2015-12-1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117481089.htm.
- [16][美] 曼纽尔·卡斯特, 马汀·殷斯. 对话卡斯特 [M]. 徐培喜,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38.
- [19][荷] 简·梵·迪克. 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 [M]. 蔡静,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61.
- [20][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94、691.

责任编辑: 宋好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工作实践路径研究

——以晋江市磁灶镇为例

钟力 杨歆琦

摘要:统一战线服务乡村振兴既是优良传统,又是实践工作的必然要求。新乡贤由传统乡贤发展而来,如今已经成为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力量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乡贤统战工作是为乡村振兴战略凝心聚力的举措之一,做好新乡贤统战工作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拥有大量新乡贤的磁灶镇,在新乡贤统战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结合走访调研的成果,梳理出乡村振兴中磁灶镇新乡贤所发挥的作用、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实践路径以及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对新乡贤统战工作作出一定思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统一战线;新乡贤;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29-07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农村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工作重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当地农村的现状,十分重视与开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结成统一战线,通过充分吸收和运用他们的力量进行土地革命,促进当地乡村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开明士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

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发生了变化,但是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从未动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在乡村工作中仍然举足轻重。在新时代乡村各阶层利益既交织又冲突的情况下、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振兴仍然需要统一战线发挥作用并且应当积极拓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

一、新乡贤与乡村基层统战工作

(一) 新乡贤的内涵界定

收稿日期:2021-09-16

作者简介:钟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杨歆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新时代新乡贤统战工作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分析——以晋江市磁灶镇为例”(SDZG2020010117)研究成果。

目前学术界对新乡贤的内涵界定并未完全统一，国内许多学者对新乡贤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过概述。例如，严旭认为，“新乡贤是指处于新时代背景下，基于自我知觉和社会知觉，一切愿意为农村脱贫和农业振兴贡献自己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乡村事业的贤能之人，有品德、有才能、有学识，而且被村民所认可和尊崇之人。”^[1]胡鹏辉、高继波将新乡贤界定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2]付翠莲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加剧，在乡村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率先富裕起来的‘能人’及愿意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贤人’，即‘新乡贤’。”^[3]吴莉娅认为，“新乡贤指积极为乡村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发展献计献策、出钱出力、有效提高当地乡村整体社会福利的个人或群体，他们有乡土情结、掌握新兴知识、有较强社会责任感，为乡村居民认可并赋权。”^[4]以上学者们均从新乡贤的产生背景、基本特征、价值作用等方面对新乡贤进行了内涵界定。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及调研走访晋江市磁灶镇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新乡贤界定为——在家乡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心系乡土，有能力且有意愿为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作出贡献的群体。其一般包括三种类型：拥有较多财富和资源的经济能人、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社会贤达以及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道德模范。

（二）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内涵界定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让村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新乡贤作为乡村建设中起着重要带头作用的群体，在乡村自治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新乡贤的人员结构组成是复杂多

元的。传统乡贤多为官僚士大夫、地方士绅，而新乡贤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它由企业家、教师、退休干部、职业农民等不同群体构成。因此，为了将复杂多元的新乡贤作为统战资源充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就需要发挥好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运用到乡村建设中来，不仅是历史传统，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新乡贤统战工作通过充分整合广大新乡贤的资源优势，引导新乡贤群体积极为农村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出资出智，以改善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二、磁灶镇田野概况

本文以晋江市磁灶镇为例。磁灶镇地处晋江市西北部，是中国陶瓷发源地之一，有“中国陶瓷重镇”的美誉，现陶瓷建材年产值 444.30 亿元，市场占比高，产品丰富，是全国四大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之一。

磁灶镇辖 2 个社区，24 个行政村。“近年来，得益于海内外乡贤的鼎力支持，磁灶乡村振兴战略有序实施，不仅先后培育了 1 个国家级‘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和 1 个泉州级、7 个晋江级‘美丽乡村’，通过实施‘人才反哺农村’计划，还挖掘、培育了一批农村治理人才，6 名农村带头人获评晋江市农村治理人才，4 名农村带头人获评省级以上劳模称号。为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实效，磁灶镇党委、政府还多次组织开展‘乡贤反哺’座谈活动，并组织全镇村（社区）主干走访浙江‘美丽乡村’学经验，引导各村（社区）更好地发挥乡贤力量反哺乡村振兴。”^[5]

伴随着磁灶镇陶瓷产业的发展，海内外磁灶籍乡贤企业家群体也得到了不断壮大。相较于本地的其他村民，乡贤企业家们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因而更有条件和能力反哺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本次调研，我们主要选取了磁灶镇的 S 村和 D 村为调查对象。两个村结合实际情况，开创出了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新乡贤治理模式。S 村有较多旅居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香港、澳门等世界各地的华侨，他们不仅有着深厚的爱国爱乡情怀，还具有较雄厚的资金实力。因此，S村探索出了以乡贤自发成立的“锦里慈善基金会”为主与村两委协助的乡贤治理模式，通过依靠新乡贤对本村的资金支持，来助力乡村发展。而D村的经济实力、村里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S村更完善，且目前更注重提升村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D村更多是借助新乡贤在村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通过充分发挥新乡贤自身的道德模范示范作用，以带领村民积极实现本村民风民俗的传承与革新。

三、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定位与作用

笔者一行人走访调研了磁灶镇S村和D村，对两个村的30名普通村民、5名村干部、4名在村乡贤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座谈采访，同时结合相关新闻报道，归纳整理出乡村振兴背景下磁灶镇新乡贤统战工作的现状。

（一）新乡贤的定位

乡贤在我国由来已久。《庄子》中说：“以财分人之谓贤”^[6]可见最初财富是划分是否为“贤”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是仅仅有财富不足以得到乡亲的广泛认可。明朝嘉靖年间，曾定义乡贤——“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7]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更注重乡贤的品德。乡贤这一群体存在历史悠久，因此，流传下来了关于乡贤的佳话。如东汉时期的甄士然、宋代的“吕氏四贤”、明朝的王良等。他们都因教书育人、教化百姓，改善乡村风貌，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新中国成立之后，受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中国的乡贤群体曾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体制创新、政治制度改革、人口结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乡村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乡村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也呼唤着乡贤的复归。

现如今，党中央在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文件中，也多次提到了“乡贤”这一概念，这

为农村工作中的新乡贤赋予了明确定位。2015年出台《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8]2016年出台《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2017年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9]2018年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需要积极发挥新乡贤的作用。2019年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增强村民自治能力”“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可见，作为乡村治理多元主体之一的新乡贤，其身份处于不断转变更新中，已由之前的文明乡风建设引领者逐渐转变为了乡村治理的参与者。

（二）新乡贤在磁灶镇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1. 促进经济发展，助力产业兴旺

磁灶镇的个别乡村先天自然禀赋较差，村财政资金困乏，各方面发展比较落后，导致对外招商引资缺乏吸引力。无论是从乡村内部打破发展壁垒还是从外部引进产业助力发展，都存在较大难度。新乡贤们起初不得不选择到世界各地闯荡，这也使得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国家均有磁灶镇新乡贤们打拼的足迹。在外打拼多年的新乡贤们，也逐渐积累起了丰富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人才资源、社会资源。但他们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想要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具有浓厚故乡情的新乡贤们，一部分选择直接在家乡投资办厂，另一部分作为企业经营人才回归家乡。随着新乡贤群体的逐步壮大，既为家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家乡带来全新的企业经营理念与模式，减轻了乡村政府招商引资的压力，降低

了乡村治理的成本。

2. 参与乡村治理, 丰富治理形式

1998 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 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10] 磁灶镇积极创新、丰富乡村治理的形式, 近年来成立了许多乡村社会组织, 例如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乡贤议事机构、老年人协会、慈善基金会等。作为社会组织之一的新乡贤组织因更具有亲和力, 能够更广泛地联系村民、了解村民, 成为了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联系人”。与此同时, 新乡贤组织还具有开放性, 新乡贤们因长年在外打拼, 能够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和先进理念, 这为乡村治理带来了不同的思路。以此次调研的 S 村锦里慈善基金会为例, 锦里慈善基金会由在外乡贤出资发起成立, 不隶属于村中的任一行政部门, 且由专门的人员来管理和维持日常的运作, 资金的使用也有专门的机构监督。当村里遇到如修建村养老院、村小学、主干道等重大事务需要大量资金时, 基金会常经过商议决定如何出资。除此之外, 慈善基金会还会为村里事务提供智力支持, 参与重大事务的协商。

3. 化解邻里矛盾, 促进乡村和谐

新时代引发乡村矛盾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有利益纷争、职责不清、权力错位、心理落差等因素。在磁灶镇 D 村积极整改村容村貌的过程中,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村里的房屋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建造, 这关乎 D 村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然而, 在整改过程中, 往往无法实现各家各户房屋建造的占地面积、房屋结构完全一致, 若不能兼顾广大村民的利益, 就无法说服村民参与其中。尤其是如果将建好的高大、宽敞的居民楼矗立在村庄中, 那么未得到新住房的村民就会产生心理落差与不平衡感, 从而影响村民团结。面对这一矛盾, D 村利用本村姓氏单一, 宗族观念深厚这一优势, 积极动员村里德高望重的乡贤, 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发挥他们调解和缓矛盾的作用, 在村两委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扮演

好沟通、协调角色, 以减少村庄房屋改造的阻力。

4. 建设乡村文化, 塑造精神价值

乡村文化是指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 其反映了各村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精神价值、道德风尚, 是当地村民特有的精神依托。乡村振兴不仅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 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因此, 发展好乡村文化既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磁灶镇将大力弘扬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一环。乡贤是乡贤文化建设中的主体, 通过以乡贤为楷模, 宣扬乡贤优秀事迹, 以进一步引导乡村风尚建设, 更好地教化村民、涵养乡风。同时, 通过弘扬学习乡贤、重用乡贤、尊敬乡贤的社会治理理念, 助推新乡贤成为乡村生活方式变革的倡导者, 实现以乡贤文化塑造当地村庄精神, 以乡贤文化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四、磁灶镇新乡贤统战的实践路径

(一) 培育情感, 吸引乡贤

新时代乡贤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村乡贤”, 另一种是“不在村乡贤”, 大部分乡贤属于“不在村乡贤”, 其长年在外经商, 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以磁灶镇 S 村为例, 笔者调研走访期间, S 村的在村乡贤不到 20 人, 大部分乡贤由于年轻时外出打拼, 现已在外定居, 很少回村。虽然长时间不回家乡, 但是乡贤们骨子里的乡土情怀是始终不变的, 乡贤们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 且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发展。这种乡土情怀也成为在外乡贤返乡置业、为家乡做贡献的主要动力。

因此, 磁灶镇有关部门充分发挥乡土情怀的纽带与黏合剂作用, 积极联系在外乡贤, 且借助多样化的活动形式, 不断完善与新乡贤的联系机制, 做好联谊交友工作。一是举办新乡贤联谊活动, 推介家乡。磁灶镇充分发挥自身“陶瓷之乡”的优势, 举办了“全球泉州籍乡贤陶瓷采购峰会”等活动, 以此为契机吸引在外乡贤回到家乡, 了解家乡, 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二是借助新媒体手段加强联络。信息化时代, 磁灶镇各村(社区)

借助QQ群、微信群、手机短信平台等媒介，建立起与新乡贤们的联络渠道，以最迅速和便捷的方式与新乡贤们进行沟通交流，及时反馈乡情乡事，告知在外新乡贤们家乡发生的变化。三是定期举办乡贤座谈交流会。在传统节日来临之时，会有大量在外新乡贤返回家乡，磁灶镇各村（社区）便以此为契机举办座谈交流会。例如，磁灶镇商会、侨联会在春节举办新春座谈会，加强磁灶镇商界与侨界人士的沟通，进一步以乡土情怀凝聚新乡贤，吸引新乡贤回乡建设；S村会在每年大年初一由村书记牵头将返乡在家的乡贤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共话家常，并在聊天中商议村里的重大事务，以引导新乡贤为本村建设献言献策。四是建设村史馆或者编写书籍，以具体的物质载体介绍本村历史、传承本村文化。如S村建有村史馆，这不仅记载着村庄的历史变革，还成为了在外新乡贤的情感寄托。五是修建祠堂和家庙。磁灶镇大多数村都只有一个姓氏，如S村的本地人都姓“陈”、D村的本地人都姓“吴”。为表达后人对祖先们的崇敬之情，磁灶镇很多村庄都会修建祠堂和家庙，以加强本宗族之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因此，这种以血缘、地缘、亲缘为纽带的乡土情怀也成为了磁灶镇开展新乡贤统战工作的重要情感依托。

（二）搭建平台，便利乡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决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一直以来，乡贤是维持地方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要继续将新乡贤纳入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中，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协调性，丰富村民自治的形式，拓展村民自治的渠道，推进村民自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新乡贤们具有高度的参与家乡建设的热情，

他们渴望为家乡建设出资出力、出谋划策。在党中央出台关于大力提升新乡贤参与度的政策影响下，磁灶镇积极为新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渠道，打造平台。

首先为新乡贤们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新乡贤在村里具有较高的威望，受到村民的敬重，在村民之中具有较高的接纳度，是新时代乡村重要的人才来源。同时，新乡贤们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愿，新乡贤通过直接参与乡村自治，既可以助力乡村治理，又可以满足他们的政治参与需求。结合这一现实情况，磁灶镇为新乡贤政治参与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途径。一是将杰出的新乡贤纳入政协组织。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其能够与社会各界保持广泛联系，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是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的重要方式。政协为新乡贤企业家们提供参与政治协商的机会，不仅加强了与新乡贤们的沟通与联系，还丰富了政协的界别组成。二是各村（社区）成立基层乡贤议事会等机构，如乡贤参事会、乡贤议事会、基金会等机构，让新乡贤们能够有平台聚集在一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以及基层事务的民主协商。三是让有才能的新乡贤担任村里的干部。磁灶镇目前很多村（社区）的书记和主任都是曾经在外打拼的新乡贤。他们带着人力、财力、物力回到家乡，渴望施展抱负，磁灶镇便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村干部竞选的机会。如S村、D村的书记此前都是卓越的企业家，且已经连续数年担任本村的村书记，通过带领村民致富，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

其次为新乡贤们排忧解难，解决他们在事业上的难题。磁灶镇新乡贤们多为经营陶瓷制造产业的民营企业家，陶瓷制造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新冠疫情的突然来临，让当地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返乡过年后无法返回磁灶镇，这导致磁灶镇的陶瓷工厂面临着人力短缺的问题。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制定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通过帮助新乡贤的企业进行招聘、

点对点接送外来务工人员返回磁灶镇等方式，以解决当地陶瓷厂人力短缺的问题。总之，当地政府为新乡贤们解决事业上的困难，提供政策上的便利，既维护了新乡贤们的利益，又保持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宣扬事迹，激励乡贤

在新乡贤们的参与下，磁灶镇各村乡村振兴成果显著。乡村振兴没有完成时，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如何激励新乡贤，保持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与动力，就需要从新乡贤们的需求入手。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层^[12]，新乡贤们在生理、安全、归属与爱的三种需求层面已经得到满足，如今需要满足的是更高层次的尊重与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地方政府要对新乡贤进行身份的肯定，对他们进行荣誉激励，从而强化新乡贤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磁灶镇有关部门采取了大量的奖励措施。一是对在乡村振兴中贡献卓越的新乡贤们颁发荣誉证书。如磁灶镇 T 村为该村慈善基金会的乡贤授予牌匾以肯定新乡贤们支持家乡建设、参与公益事业的热心和爱心。二是借助媒体对新乡贤们的优秀事迹进行宣传。宣传媒介多种多样，如村镇的公众号、当地各类报纸和当地政府的门户网站等等。借助多种媒介方式传播，既保证事迹宣传的覆盖面，又兼顾了群众的接受度，能让更多的村民了解新乡贤、认同新乡贤。三是设立功德碑。捐资之后，无论款项数目大小，S 村都会将姓名和金额镌刻在一块功德碑上，并将其安放在村内广场，来来往往的人均能看到。通过这种方式，让新乡贤的良好口碑世代流传，同时，在全村形成了村民热心公益慈善的良好氛围。

五、当前新乡贤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新乡贤的定义尚未统一明确

随着新乡贤统战工作的不断发展，多样化的新乡贤治村模式在全国各地也逐渐得到了推广。然而，由于各地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不尽相同，新乡贤工作也具有了地域性。同时，仅

有部分地区对新乡贤这一概念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如“仙居县对新乡贤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乡贤应是户籍、原籍或姻亲关系在当地，在当地投资创业，品行好、有声望、有影响、有能力、热心社会工作的贤达人士，包括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退休干部、企业家、华侨华人、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等本地精英、外出精英和流入精英。”^[13]但是，本次所调研走访的磁灶镇却尚未对新乡贤提出明确的定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磁灶镇大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对新乡贤的定义大多都很模糊，认为“新乡贤”一般都具备“德高望重”“经济贡献”“热爱村庄”这几类品质，但却没有清晰和精准的定义。因此，应加强对新乡贤这一概念的科学认定，以增强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合理性、增强新乡贤的纯洁性和代表性。

（二）新乡贤身份识别比较狭隘

“新时代，乡贤被赋予新的内涵，其涵盖范围更广且具有地域性、平民化、社会声望高、掌握先进文化、秉承主流价值观、民主法治意识强等方面特质。”^[14]如此看来，一切热爱乡村事务、办事公道的乡村群众都可以被选拔或推荐为新乡贤。然而，磁灶镇的新乡贤代表主要为经济能人。在问及村民“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新乡贤？”村民大多回答：“为家乡捐款、支持家乡建设的企业家们可以称为新乡贤。”可见，磁灶镇在对新乡贤身份识别的思想观念上存在不足，认识比较狭隘、固化。因此，要想改变磁灶镇新乡贤身份较单一的问题，需从改变村民对新乡贤的固化判断标准开始。除此之外，识别新乡贤，还应当立足本地发展特色，合理利用资源，以扩大新乡贤群体的范围。

（三）新乡贤统战工作有待加强

基层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新乡贤统战工作是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磁灶镇新乡贤代表在乡村治理中呈现出人数增多、覆盖范围广的趋势，但统战工作却出现力量不足，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的问题。

第一,缺乏专业的基层统战人员。磁灶镇部分乡村未设置专门的统战部门,除此之外,负责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大多也只是兼职人员;有的村虽在村委会设置了统战办公室,却只负责本村的侨眷和宗教工作。第二,基层统战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他们有的专业知识储备较少,且对统战工作及统战政策缺乏准确、深入的了解。谈到新乡贤统战工作,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认为就是平时逢年过节拜访一下新乡贤们及其家属。可见,亟须提高基层统战工作人员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服务能力。统战工作人员应当通过及时了解基层统战工作最新动态以及新乡贤们的最新需求,助推统战工作做深做实。

参考文献:

- [1] 严旭.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22(1): 77-80.
- [2] 胡鹏辉, 高继波. 新乡贤: 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20-29, 144-145.
- [3] 付翠莲.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J]. 地方治理研究, 2016(1): 67-73.
- [4] 吴莉娅. 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6): 86-90.
- [5] 晋江新闻网. 磁灶乡贤力量反哺乡村振兴[EB/OL]. (2019-03-08). http://fjjj.wenming.cn/whyd/201903/t20190308_2996246.html.
- [6] 郭象注.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444.
- [7] 袁灿兴. 中国乡贤[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
-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EB/OL]. (2015-02-02). <http://www.audit.gov.cn/n4/n18/c62186/content.html>.
- [9]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EB/OL]. (2017-02-05).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2/05/content_5165626.htm.
- [10] 孙敏. 乡贤理事会的组织特征及其治理机制——基于清远市农村乡贤理事会的考察[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49-55.
- [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J]. 求是, 2013(22): 3-18.
- [12] 李捷. 消费者行为学[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 100.
- [13] 李传喜, 张红阳. 治理型统战: 新乡贤统战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发展[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4): 92-100.
- [14] 张兆成. 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与社会功能[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154-160.

责任编辑: 王天海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优势、功能和作用

许奕锋 谌 炎 孔建华

摘 要: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突出阐述了协商民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参与、民主权利和科学民主决策方面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我们深入研究协商民主的优势、功能和作用提供了一个非常宽阔的理论视野,也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拓展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空间。我们在研究中需要突破把协商民主的优势与作用混为一谈而造成研究探析层次不明、视角不清、无的放矢的局限性。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不仅需要理论阐释和制度设计,还需要在鲜活的、生动的实践中理解其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和意义,明确辨析其优势、功能和作用及其逻辑关系,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协商民主建设探寻更加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发展进路。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优势;功能;善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36-09

从历史与现实的发展逻辑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探索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孕育和生成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独特优势和实践创造。十八大以来,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断得以拓展和提升。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既是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战略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渠道和重要方式,有其与西方民主政治相比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的鲜明优势,有其在国家

收稿日期:2021-09-10

作者简介:许奕锋,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谌炎,中共怀化市委党校讲师;孔建华,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党协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系研究”(17BDJ060)、2020年度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ZK20200231)阶段性研究成果。

治理实践中越发能够彰显的内在功能，并在促进我国国家制度特别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中，推进了国家治理善治理念的生动实践。

一、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独特的比较优势

有学者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民主建构能力的关键，不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民主化的潮流，而在于其在民主化的浪潮中，能多大程度上保持内在的定力，从而能够时刻回到自身的发展逻辑，真正从自身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所形成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出发来布局民主的建构^[1]。在我国，协商民主不断得以发展，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也成为了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身内在的独特优势，有其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逻辑自洽。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协商民主具有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有厚重的文化基石、强大的领导力量、丰富的实践支撑、日臻规范的制度体系，是内生性的民主形式。

（一）基础性优势

所谓基源，即基础和根源，是协商民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与依据。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理论资源，任何国家的民主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环境。从政治实践来看，西方政党政治虽具有激烈的竞争色彩，但也包含了协商民主精神，其“政党或利益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协商，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惯例”^[2]，并以不同程度的协商方式体现了一定的协商精神。但不可忽视的是，西方社会的宗教、种族以及阶级冲突也深刻地构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困境，更由于其历史发展中文化基因的断裂、消失甚或异化造成了西方协商民主因其文化基因的不完整性存在诸多缺陷。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对协商主体的先验预设造成主体“预设素养”与“实践德行”断裂，即基于公共理性的“政治人”与追求利益偏好的“经济人”相互抵牾、主体对话能力的均质性要求与其商谈能力的异质性要求存

在落差、“包容妥协”的齐一性政治诉求与“尊重差异”的多元性现实形成张力^[3]，从而使得西方协商民主的现实实践存在诸多障碍。我国虽然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影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但是梳理历史就不难发现，自秦汉以来，协商、讨论、辩论等成为了历朝历代的一种政治传统（诚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执政思想、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得道多助的理政思想、兼容并蓄的人文思想等等^[4]，构筑了中华优秀政治文化深厚的文化基石，也形成了协商民主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文化氛围或文化环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而不同”特定的文化精髓和文化品格，推动着协商民主秉承求同存异的文化价值获以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也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实现了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超越。

（二）实践性优势

协商民主一直是西方理论家解读和决策者操控所谓民主政治的一种工具，具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乌托邦色彩和工具性价值。在实践中，西方协商民主存在协商共识和决策执行的断裂，往往重自由表达、轻整体诉求，重协商过程、轻决策结果，重形式、轻内容，多元冲突、多元撕裂、多元碎片等问题难以实质性化解^[5]，甚至一度把协商民主束之高阁，成为一理论摆设。在我国，协商民主就是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围绕国家建构、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不断探索和实践得以发展的。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围绕国共合作进行协商会谈，推动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形成。1935年瓦窑堡会议讨论决定采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40年为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就是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和制度化探索，这也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召开，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在协商建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其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的履行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6]，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我国历任国家领导人，都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关注和重视协商民主。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紧密结合国家治理的时代要求，生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基层协商等，发挥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实践优势。

（三）领导性优势

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因其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设计以所谓和平的、合法的方式获取、配置与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在实践运行中难以摆脱金钱政治、垄断财团甚至某些军事力量的控制^[7]。我国的政党政治，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制度依据，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型政党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最大的优势，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的作用发挥，也就离不开这一领导优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商民主就有了方向和政治依靠，就有了主心骨和定盘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国家强大的组织网络，列席“两会”、参加听证会、参与电视问政等等，协商民主成为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多元多样化的协商方式和协商渠道，能够使处于离散状态的个体意志变成网络议题或社群观念，避免偏激的、冲动的、非理性的行为，减少协商程序混乱和协商资源内耗，以保证公民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政治参与，这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真谛与妥协的含义^[8]。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利益格局，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合理引导决策、政治、制度等的制定和执行，推动协商民主制度得以贯彻落实，并为多元利益主体提供协商对话平台，营造平等交流的协商氛围。在动员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基层组织等积极参与的同时，也善于

引导不同治理主体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中进行理性选择，使得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等主体能够通过协商达成符合国家、集体、人民长远利益或综合利益的决策共识，避免西方协商民主议而不决、议而难决的民主弊端，从而有利于把协商共识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践效能。

（四）保障性优势

国家治理需要建构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和制度格局，实现对国家和社会高效的系统治理和规范治理。具体到制度安排而言，不难理解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和面对的社会环境。西方民主理论家把协商民主建构的“理想”公民预设至上，即预设每个公民都具备了公共理性、对话能力和包容心态等公民素养基础上。这种因公民基于“政治人”和“经济人”之间的现实矛盾使得协商民主的实践遭遇“不真实的表达”“虚假民主”等困境，甚至使得协商民主异化为个人或团体谋取利益的“合法工具”，其制度化建设因利益和价值观的相互对峙成为了横亘在理论规范性与现实可行性的巨大障碍^[9]。在我国，协商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了公共利益的价值指向，既体现为一种现代民主理论，也具体成为了一种民主政治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服务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政党理性，以关切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在主导协商民主发展中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有效回应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科学规范的现实要求。特别是 2015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10]，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指明发展方向。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

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201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等等文件精神，推动了协商民主在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要使协商民主形成贯穿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多层次制度格局；要使协商民主覆盖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组织，同时也延伸到社会生活等领域；要使协商民主涵盖立法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政党制度、自治制度等方面，形成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11]由是，协商民主产生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这一历史发展中，不断通过实践探索、经验总结、理论分析和制度提炼等，逐步形成了正确的、科学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二、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

关于协商民主的国家治理功能，学术界大多从培育参与主体、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健全体系机制、实现善治目标和夯实治理基石等方面进行概况，也有的从决策机制、决策效果、协商带来的政治效果等研究协商民主的功能^[12]。实际上，从功能特征上来看，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战略发展层面上承担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民主政治重任。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建设，发挥内涵于自身的秩序、效率和民主协同共进的政治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建立在民主合法性、公民参与理性、维护社会公正性、决策科学性等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发展，其功能可以体现在“主体—路径—基础—目标”四维体系上来。

（一）协商理性培育功能

传统的治理理念认为，政府与民众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但在现代治理理念中，政府与民众之间或许依然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但更强调政府与民众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协同关系。

民众以公共管理主体的身份出现，关心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也就决定了在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培育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13]。有研究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维护中央权威，确保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也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地方的治理能力^[14]。国家治理需要的是政令畅通，能够实现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畅通执行和自下而上的执行反馈。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积极主动参与必不可少，而协商民主就为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化渠道，提供了政策沟通和参与实践的平台。民众正是因为通过协商民主的参与实践，可以很好地增强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和精神，“在这里，积极的公民进行直接的自我管理，他们并不必要在每个层次和每个事件上进行具体管理，但是，在做出基本决策和进行重大权力部署的时候他们必须经常充分和详尽地参与。”^[15]协商民主主张的平等、理性、规则等制度精神和规范意识对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和精神培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科学决策推进功能

协商民主是解决和应对当前社会多元化问题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协商民主的过程，既是不同协商主体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化解矛盾和扩大共识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按照协商民主的程序性安排达成最大程度共识的过程。回顾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十年浩劫，满盘皆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决策失误，协商失语，协商民主难有一席之地。当前社会越发复杂，党委政府的决策完全依靠某个人的大脑和经验显然不够，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民主决策，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择善而从，才能在国家治理上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少走弯路^[16]。协商民主作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协调各个方面、凝聚广泛共识进而推进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体现。在协商民主过程中,主张人民群众、社会团体等方面参与到政治决策、政策的制定过程,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提供积极意见和看法。决策者在颁发文件和决策部署过程中经过必要的、广泛的充分讨论和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进而形成政治与公共生活中不同主体多元、真实和广泛表达的公众意志,可以避免不连贯的政策浪费和效率缺失,避免决策过程中的相互牵扯和低效内耗,使得决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受到合理的民主监督,可以确保决策最终快速而有效地执行。换言之,协商民主可以推动在国家大政方针或基层公共事务方面形成共识,确认公共利益的内容、范围和边界,把作为不同主体意志之和的众意,聚合转化为作为不同主体公共意志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奠定公共治理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促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三) 执政之基夯实功能

当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不断夯实执政之基,改进方式方法,做到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用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方式,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寓领导于协商之中作为党的领导方式,能够有效动员各类协商主体积极、主动、自觉地实现党的主张和国家政策法律,进而保证党的主张和国家政策法律的贯彻落实。以政党协商为例,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展开政党协商会议 170 余次,先后就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报告、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建议、国家领导人建议人选等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确保重大问题决策更加科学、民主。

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深入考察调研,提出书面意见建议 730 余件,许多转化为国家重大决策。”^[17]政党协商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制度保障,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选举和彼此对立的政见之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你死我活、诋毁谩骂,而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道为国家治理的发展而建言献策、出力使劲,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国的协商民主过程,既是广泛听取各种不同声音、充分吸收有益意见建议的过程,也是让社会各界了解和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不难理解,通过协商民主可以将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程序化、法治化的模式中,有利于将党和政府的决策行为科学化,能够保证国家权力统一行使的同时也推动各类协商主体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意愿和人民权力的尊重,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利于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以及参与政府公共服务甚至与政府协同管理,形成多元合作共治的结构,进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确保党领导人民有效进行国家治理^[18]。

(四) 广泛共识凝聚功能

全球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为人们获取信息带来技术便利和资讯便利的同时,也给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民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词语,“民意形态也发生着悄然变化”^[19],具体体现在社会领域上就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的共识凝聚成本不断提高,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分析判断难度也在相应增加。过去传统的小数据信息和人工经验性决策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民主政治需求,必然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改善协商民主的机制和效果^[20]。这就意味着协商民主需要回应民意信息流中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注重提升置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协商民主的民意吸纳和反映能

力，注重最大程度地凝聚各个方面的广泛共识。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力中枢，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各政治主体通过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来讨论公共事务，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以政协协商为例，人民政协组织进行提案办理协商、界别协商、大会发言等，使相关决策或文件制定更加符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从而能够得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与支持。组织行为学认为，“一种行为的启动和行为过程的维持，主要取决于行为者对自己相关行为技能的预期和信念。高自我效能感将产生出足以争取成功的努力，成功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强化自我成功的期望；反之，低自我效能感可能造成提前停止努力，导致失败的结果，并由此削弱对自己胜任力的期望。”^[21]这也意味着，当个体通过坚持不懈而完成艰巨任务时就会获得积极的自我效能感，这种效能感在以后的任务中会为个体提供能力的保证，并且使个体在遇到失败时仍然保持自信。从这个角度来看，共识作为一种高自我效能感，同样需要一种积极的预期或信念。协商民主亦如此，通过广泛而又充分的协商和讨论，使各协商主体能够积极参与讨论、交流思想、反映诉求、表达意见等等，并体验到决策是在有自己的参与中共同做出的，能够形成一种高自我效能感，由此更容易形成某方面的共识。与此同时，各个协商主体在协商交流中，容易激发或增强执行政策或落实决策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推动相关政策文件和决策部署的执行。有的甚至在协商交流中，通过思想交锋、思维碰撞等思辨之后能够更加自觉服从党和国家权威，更加主动维护国家政党制度和政治体系，更加积极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形成坚定的思想政治共识。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协商民主之善治作用

作用和功能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功能作为事物自身固有的效能，是一种内

在于事物本身相对稳定的独立机制，也是作用产生的内在根据和前提基础。而作用作为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所产生的效应，是外在客观环境诸多元素所需要的价值体现或影响。协商民主的作用亦如此，同样是其与外在客观需要相结合的实际影响和效能体现。“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要充分发挥好协商民主的优势和功能，就需要结合协商民主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相关结构要素所形成的作用和影响，推进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有序运行和发展完善，使其更好地转换为国家治理的效能。

（一）推进价值引导，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是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源泉。任何制度的背后，往往都是深嵌其中的文化理念。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以及协商民主制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文化层面的价值实现问题。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消极文化元素，比如政治依附、权威崇拜、臣民顺从、宗法观念等一定程度地阻碍了协商民主的现代化发展，给我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挑战。换句话说，要发展协商民主，离不开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一个参与型政治体系的民主形式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22]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厘清协商民主的文化价值诉求。正如孟子指出，“徒法不足以自行”。作为人所制定的规则或规范，制度本身并没有实施自己的力量。要真正成为有效的制度，必须依靠一定的文化理念或文化价值取向。事实上，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且在这方面每个人又各不相同。由于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认知水平、所追求的物质精神需求等不尽相同，会存在诸多差距甚或产生诸多矛盾。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方式多样，但是依靠文化的力量化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方面，而协商民主就内涵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在协商

互动中依靠文化的熏陶、激励、凝聚、润滑、整合进行价值引导,可以将公正、正义、公平、真诚等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嵌入各类协商主体的心中。基于协商民主所彰显的多元性、公开性、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创建宽松自由开放的协商形式,需要培养与之相适应的参与文化、平等文化、宽容文化和公民文化,发掘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中的深厚精神资源,提升民众对协商民主思想和实践的理解和认同,有效激发不同协商主体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意愿。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的农民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在心理上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存在不愿学习、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落后思想;有的还在精神情感上过于依赖党和政府,缺乏独立自主意识;还有的组织合作观念低,目光短浅、封闭自守、不愿协商交流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带来困扰。这就更加需要加强价值引导,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工作,逐步培育基层民众符合时代发展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化观念。

(二) 推进平台建构,缓释矛盾优化治理环境

协商民主的价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呈现,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需要建构一系列的制度机制,为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搭建能够发挥作用的平台。在协商民主实践中,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完备的组织体系,建构起系统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协商平台,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等^[23],全面系统搭建起政党之间、党政之间、党群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等平等协商的桥梁。以政协协商为例,各级人民政协参与到国家治理,并创新了一系列组织延伸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体现为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直接参与,即通过其组织内部的合作与沟通解决国家治理中的一些问题;也体现为人民政协作为国

家治理的协商主体以其各党派、各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通过政治协商这一制度化渠道参与国家治理,或以提案、建议等方式反映社会和公民的利益诉求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或以意见、建议等方式督促政府纠正国家治理路径的偏差。作为政协组织中的委员个体,以其智慧、学识、资源等在所在领域、所属行业产生国家治理的影响,以其领头羊似的引领或动员作用,聚集相关分散的民众参与和服务国家治理,依托人民政协这一平台,或者通过所在的界别渠道,或者在人民政协指导下建立委员工作室等等,释缓各种利益冲突,化解各种利益矛盾,不断优化国家治理环境。

(三) 推进机制健全,塑造协商参与理性氛围

习近平曾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24]一定意义上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调节好政府、社会与公民这三者的关系并有效发挥它们的合力性价值。以往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获得了国家治理规则制定和执行实施的权力,其触角延伸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然而“政府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但是却不能有效地调节其管辖范围之内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配置”^[25]。协商民主能够为政府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提供一种各相关治理主体相互作用的有效机制,政府应在作为民主决策理论的协商民主中,给予社会和公民在决策中更多的地位和权重^[26]。与此同时,协商民主也激发了各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意愿,鼓励并引导各种社会组织通过协商民主渠道和平台参与国家治理,利用并健全理性沟通、坦诚交流、商讨对话等运行机制以收集、甄别各种讯息和知识。公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主体,所有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27]。协商民主在广泛多层制度化推进的同时,也赋予了公民主

动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意愿和活动空间,推动了公民理性在协商治理中得以塑造,自主意识在协商治理中得以发展,合作精神在协商治理中得以发挥。

(四) 推进制度建设,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学者针对选举民主的不足甚至缺陷,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其理论建构的完美也难以掩盖其实践的不足^[28]。在我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不排斥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实现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协同发展。从民主过程来看,协商民主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贯穿于国家治理、重大决策的全过程。习近平曾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性、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29]但是从现实实践来看,协商民主的发展目前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为协商民主技术相对落后、方法相对简单,特别是缺少制度基础以及明确的法律保障,这使得协商容易陷入形式化、随意化和表面化。要发挥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中的应有效能,就需要从制度上解决协商民主作为党和国家决策与治理过程中的原则、规范问题。当前,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进行了制度规范上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这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协商民主立足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既根植于悠久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又反映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协商民主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

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制规范。同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丰富了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人类发展政治文明作出贡献。

总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显著功能和善治作用,有利于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引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30]。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理论上实现了对西方协商民主的中国化超越,从实践上解决了西方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并以其鲜明的比较优势、显著的内在功能和善治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有效转化成国家治理效能,展现出特有的民主魅力,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道亮丽的民主风景。

参考文献:

- [1] 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
- [2] 吴兴智.协商民主与中国乡村治理[J].湖北社会科学,2010(10).
- [3] 徐伟明,解丽霞.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现实困境与中国化超越路径[J].理论月刊,2020(4).
- [4] 许奕锋.协商民主的文化基因检视[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 [5] 徐凤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程序化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功能[J].理论导刊,2015(5).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6.
- [7] [澳]约翰·芬斯顿.东南亚政府与政治[M].张锡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5.
- [8]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5: 145.
- [9] 徐伟明, 解丽霞.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现实困境与中国化超越路径 [J]. 理论月刊, 2020(4).
- [10]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 人民政协报, 2015-02-10(01).
- [11] 陈家刚. 党的领导与协商民主 [J]. 江汉论坛, 2018(11).
- [12] 邱雨. 协商民主的国家治理语境: 基于文献综述的考察 [J]. 社会科学动态, 2019(8).
- [13] 桑玉成. 培育人民群众的国家治理主体意识 [N]. 人民日报, 2018-1-15(07).
- [14] 李宝银. 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动态平衡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5-20(08).
- [15] [美] 本杰明·巴伯. 强势民主 [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5.
- [16] 李忠尚. 论科学决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从智囊、软科学到智库的理论与实践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8(3).
- [17]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全文) [EB/OL].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07415/1707415.htm>.
- [18] 孙宝林. 协商民主的优势与作用 [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4(2).
- [19] 汪波. 大数据, 民意形态变迁与数字协商民主 [J]. 人大研究, 2015(11): 4-12.
- [20] 欧阳康, 曾异. 国家治理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认识历程、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转化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 [21] 姚凯. 自我效能感研究综述——组织行为学发展的新趋势 [J]. 管理学报, 2008(3).
- [22]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 公民文化: 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 [M]. 张明澍,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3.
- [23]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37.
- [24]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J]. 求是, 2014(1).
- [25] [美] 沃尔特·W. 鲍威尔, 保罗·J. 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M]. 姚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68.
- [26] 柴宝勇. 简论人民政协民主: 概念、原则与制度化建设 [J]. 中国政协理论研究, 2013(4).
- [27] 俞可平.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N]. 南京日报, 2013-12-10(7).
- [28] 欧阳康, 曾异. 国家治理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认识历程、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转化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4.
- [30] 魏晓文, 徐凤月. 国家治理视阈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功能及其优化 [J]. 中州学刊, 2015(11).

责任编辑: 鲍跃华

重庆市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

——以涪陵区为例

宋晓云

摘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涪陵区是工业强区,民营企业占据市场主体的97.38%,是市场的中坚力量。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衡量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18个指标进行权重测算,根据六大产业分类挑选出代表性的12家企业进行专家评分,并结合指标权重进行综合得分测算,得出代表性企业中多数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不足85分。为此,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部门引导作用,增强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聚焦数字化转型新突破,加大民营企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强化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提升数字技术生产管理应用能力;重视数字人才效能发挥,加强民营企业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关键词: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涪陵区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45-09

一、研究述评

(一) 关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要性研究

徐晓新(2021)^[1]、李辉(2020)^[2]认为人类社会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到以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再到今天发展成为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下发展数字经济也被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为促进民营企

业数字化转型,相关部门在2020年制定了一系列政策,2020年4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3],同年5月13日全国工商联等17家部门联合发布了《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4],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5]等,这些政策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二) 关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要素研究

学者们对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要素

收稿日期:2021-10-08

作者简介:宋晓云,重庆市涪陵区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委托课题(CQSYWTKT210006)阶段性成果。

做了大量研究，一般根据变革部门和产生来源划分为四种类型。Tan&Pan（2015）根据变革部门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技术型数字化转型和组织型数字化转型，其中技术型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内部的技术部分进行数字化转型，而组织型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对整个组织架构都实行数字化改造^[6]。唐兴通（2017）根据产生来源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内源型数字化转型和外源型数字化转型，其中内源型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而外源型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7]。郭云武（2018）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并不是只拥有一个驱动要素，企业可能同时受到内源和外源动力的驱动^[8]，同时，在企业内部的转型也很难界定只是发生在技术部门还是在整个组织^[9]。

（三）关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及测度方法研究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部分企业负责人数字化转型意识不强。张夏恒（2020）通过对全国 377 家样本企业的实际负责人进行调研发现，21.05% 的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完全不了解，26.32% 的中小企业略微了解^[10]；二是民营企业自身规模有限能力难以提升。王灏晨（2019）认为民营企业自身生产规模较小，难以从数字经济中获得规模经济或者范围经济^[11]。

目前学者们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方法多采取层次分析法（AHP）。通过对 CNKI 数据库搜索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发现，在 404 篇相关研究中仅有 10 余篇文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了测评，其余多为理论或者案例分析某一特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问题，其研究方法缺乏多样性，研究视角缺乏全面性。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结合涪陵区实际，测量涪陵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状况，分析转型困境，提出对策建议，力争为涪陵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一定借鉴。

二、涪陵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困境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平衡

涪陵区有清洁能源、新材料、食品医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 5 个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集群，工业产值规模位居全市前列，是主城几个区之外的首个千亿级区县。拥有太极集团、华晨鑫源、涪陵页岩气、万达薄板、华峰化工等百亿级企业 5 家，18 户龙头企业跻身重庆 100 户重点工业企业，占全市的 18%，这些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较快，数字车间普及率居全市区县第一。但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较多，困难重重，整体数字化转型率不高，不同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不平衡。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不牢

目前，涪陵区已建成 1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2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13 家重庆市级众创空间，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52 个，拥有国家科研机构 12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2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4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 个、独立法人研发机构 7 家，但都处于起步阶段，利用率也较低。除此之外，涪陵区在数字化人才、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待提高，通过对涪陵区大数据局、涪陵区组织部人才办、涪陵区发改委、涪陵区人社局调研发现，目前涪陵区关于数字化人才引进的专门政策还不健全，数字化人才信息库、数字化人才引进渠道等未畅通。除了人才基础没打牢之外，5G 基站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仍未健全。

（三）企业家数字化转型思维不足

一是理解不深。许多民营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并不理解，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于企业发展没有意义。二是认识不足。许多民营企业家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势与必要性认识不足，未能理解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战略，是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12]。三是意愿不强。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家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性,但考虑到目前企业基本情况以及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就会望而却步,存在“不会转”“不想转”思想。

(四)企业经营柔韧性不强

民营企业发展受自身产品特点、经营策略、国际环境、国内竞争等多方面影响,且民营企业是自担利损,自身脆弱性较大^[13]。新冠疫情的肆虐,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波动,增加了民营企业自身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数字化转型难度,提高了数字化转型风险。导致民营企业自身脆弱性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一是自身规模不大,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企业扩大投资难以实现规模效应,而对于数字技术研发利用的投入成本很难收到短期回报;二是融资能力较差,民营企业实力背景不一,信用风险、经营风险较大,而银行对于风险把控有一定标准,超过风险标准就不会放贷,导致许多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较难。

(五)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度不一

一是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导致数字化转型难度不一。涪陵区民营企业根据成熟阶段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成熟企业,此类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已初具规模,主要包括涪陵区几家百亿级企业,如太极集团、涪陵榨菜、华晨鑫源等等;第二类是较成熟企业,此类企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较小;第三类是刚起步企业,一切都在摸索,每一个决策都非常谨慎,稍有不慎会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进行数字化转型困难较大。二是不同地区导致数字化转型难度不一。不同地区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力度不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也不同。数字经济是近几年刚提出的,涪陵区虽是工业强区,但在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力度上仍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亟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体制机制。三是不同产业导致转型进展差异。涪陵区目前有六大支柱产业,上述提及的百亿级企业包括在这六大类中,不同企业其生产周期不同,数字化转型的

难易程度和时间也不尽相同。

三、涪陵区民营企业数字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测度指标体系,首先要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根据《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实践研究报告》的定义,数字化是指将各类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计算来进行应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将某个生产经营环节乃至整个业务流程的物理信息链接起来,形成有价值的数字资产,通过计算反馈有效信息,最终赋能到企业商业价值的过程^[14]。根据上述定义,下文将通过构建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测量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应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主观赋权法主要是指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该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提出的。它是一种将复杂、烦琐的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系统分析,通过将复杂问题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层级分解,结合专家和研究者的判断评分,进一步通过模型计算而得出其权重,并根据权重测出其评分的一种方法。

(二)指标模型构建

目前涪陵区部分食品医药产业、信息技术等数字化车间比重较大,而新材料、清洁能源两个行业数字化车间仍需进一步加快发展。本文根据涪陵区六大产业特点,结合学者陈畴镛、许敬涵(2020)的研究指标选取,最终选取了6个二级指标、18个三级指标^[15]。其中一级指标即为最上一个层次,也即目标层,最下面的一个层级为三级指标,也即方案层或者对象层,中间的一个层级为准则层或指标层。具体如下:

1. 数字化基础设施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为描述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选取

主干网与互联网接口带宽、主干网网络覆盖率、数据安全措施应用率 3 个指标来进行描述。其中主干网是企业所有通信和数字化相关系统的承载体，主干网与互联网接口带宽是反映企业数据传输量的重要指标，主干网网络覆盖率是反映企业网络覆盖率的主要指标，数据安全措施应用率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和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指标^[16]。以上 3 个指标分别从网络数量、网络覆盖率、网络信息安全三个方面描述企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状况。

2. 数字化研发

数字化研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支撑，数字化研发程度越高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为合理、准确描述企业数字化研发力度，选用新产品产值率、R&D 投入强度、员工人均专利数 3 个指标来进行描述。其中新产品产值率是指一定报告期内新产品产值与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企业一定报告期内新研发的产品投入生产并适应市场变化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衡量企业研发能力具有很强说服力。而 R&D 投入强度、员工人均专利数两个指标则是描述企业为增强研发能力投入的客观保障，两者数值越高，表明企业为科技和创新投入力度越大，专利数越多，企业越能进行转型。以上 3 个指标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反映企业的研发力度，描述性更强。

3. 数字化投入

数字化投入是从具体的数字化投入财务数值占比方面来体现企业对数字化转型投入的力度。为描述这一变量，选取了数字化投入占比、数字化设备投入占比、数字化运维占比 3 个三级指标来进行描述。其中数字化投入占比表示企业数字化方面的投入占企业总投入的比重，占比越高，表明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发展越重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可能性越大。数字化设备投入占比、数字化运维占比是具体企业在购买数字化设备以及进行数字化运行和维护方面的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同理，这两个指标越高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可能性越大，以上 3 个指标都能准确反映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力度以及重视程度。

4. 数字化人才

本文选用数字化技能员工覆盖率、初级数字化技能人才培养支出比、数字化人才比重 3 个指标来描述数字化人才。目前涪陵区由于数字化人才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数字化人才相关证书仅颁发 1 个，数字化人才统计口径不完善。因此，本文选用以上 3 个指标来衡量涪陵区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状况，其中数字化技能员工覆盖率，反映企业员工对于企业数字化设备的应用情况，数值越高，表明越多的企业员工会进行数字化设备应用，从而间接反映企业拥有越多的数字化设备，也就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初级数字化技能人才培养支出比、数字化人才比重这两个指标都是反映企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重视程度以及企业拥有数字化人才数量的指标。以上 3 个指标都能准确反映企业拥有数字化人才的数量，数字化人才越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就越容易实现。

5. 业务数字化管理

业务数字化管理是指企业所有业务运用数字化进行管理，这一指标越高，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本文选用数字化仓储物流占比、订单准时交付率、电子商务采购比率 3 个指标来对业务数字化管理这一指标进行描述，其中数字化仓储物流占比是指企业进行产品的仓储、物流、管理等运用数字化技术的比率，这一比例越高，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订单准时交付率是指企业运用大数据、网络化等数字化设施进行联动供应链上下游，消除时间延误，快速反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指标，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联动能力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电子商务采购比率表明企业进行采购时运用电子商务技术的比率，这一指标与传统实际采购率相对应，电子商务采购比率越高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

6. 生产数字化管理

生产数字化管理是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指标,企业生产都运用数字化进行,那么企业就已经向数字化转型迈出了一大步。本文选用作业计划自动编制及优化排程的比例、与PCS或MES直接相连的数字化设备占比、数字化检测与监控设备占比3个指标来衡量生产数字化管理。3个指标均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数字化技术对产品生产的各个流程进行数字化控制、检测的指标,也是数字化车间的具体表述。根据以上6个二级指标和18个三级指标,构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1所示。

表3-1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A)	数字化基础设施(B1)	主干网与互联网接口带宽(C1)
		主干网网络覆盖率(C2)
		数据安全措施应用率(C3)
	数字化研发(B2)	新产品产值率(C4)
		R&D投入强度(C5)
		员工人均专利数(C6)
	数字化投入(B3)	数字化投入占比(C7)
		数字化设备投入占比(C8)
		数字化运维占比(C9)
	数字化人才(B4)	数字化技能员工覆盖率(C10)
		初级数字化技能人才培养支出比(C11)
		数字化人才比重(C12)
	业务数字化管理(B5)	数字化仓储物流占比(C13)
		订单准时交付率(C14)
		电子商务采购比率(C15)
	生产数字化管理(B6)	作业计划自动编制及优化排程的比例(C16)
		与PCS或MES直接相连的数字化设备占比(C17)
		数字化检测与监控设备占比(C18)

四、涪陵区民营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测度

(一) 建立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是根据专家学者对同一层级两两指标比较的打分结果,建立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萨蒂(Saaty)提出了选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标度的比例标度表作为打分依据,具体步骤为:首先,将同样层级元素进行两两比较并依据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其次,运用数学计算方法计算出同样层级元素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最后,计算出所有层级元素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为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本文在调研中设计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价指标重要度专家调查

表》,并邀请8位分别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业内专家等进行了访谈并填写调查问卷。比例尺度表具体如表4-1,判断矩阵具体如式4-1。

表4-1 比例标度表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重要性相同
3	表示前一因素比后一因素略显重要
5	表示前一因素比后一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前一因素比后一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前一因素比后一因素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两因素比较,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A = a_{ij} = \begin{matrix} a_{11} & a_{12} & a_{13} & \dots & a_{1n} \\ a_{21} & a_{22} & a_{23} & \dots & a_{2n} \\ a_{31} & a_{32} & a_{33} & \dots & a_{3n}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a_{n1} & a_{n2} & a_{n3} & \dots & a_{nn} \end{matrix} \quad (\text{式4-1})$$

若每次取两个因素 X_i 、 X_j , a_{ij} 表示 X_i 与 X_j 对Z的影响程度之比, a_{ji} 表示 X_j 与 X_i 对Z的影响程度之比,且 $a_{ji}=1/a_{ij}$ 。式4-1中A为全部比较结果的判断矩阵。

(二) 计算权重

用方根法计算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具体如下:

1. 通过式4-2计算判断矩阵每行所有元素的几何平均值:

$$\bar{m}_i = \sqrt[n]{\prod_{j=1}^n a_{ij}} \quad (i=1,2,3,\dots,n) \quad (\text{式4-2})$$

得到新的矩阵 $\bar{m}=(\bar{m}_1, \bar{m}_2, \dots, \bar{m}_n)^T$ 。

2. 将 \bar{m}_i 进行归一化处理,如式4-3所示:

$$m_i = \frac{\bar{m}_i}{\sum_{i=1}^n \bar{m}_i} \quad (i=1,2,3,\dots,n) \quad (\text{式4-3})$$

得到新的矩阵 $m=(m_1, m_2, \dots, m_n)^T$,即为所求的近似特征向量,也是各指标的相对权重。

(三) 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运用层级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计算,为避免各指标之间两两相比之后,出现指标重要性矛盾的状况,需要对指标之间的重要性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步骤如下:

1.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_{max} ,如式4-4

所示：

$$\lambda_{max} = \sum_{i=1}^n \frac{(Am)_i}{nm_i} \quad (i=1,2,3,\dots,n) \quad (式 4-4)$$

其中 $(Am)_i$ 为判断矩阵 A 与向量 m 之积的第 i 个数值。

2. 计算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 CI (Consistent Index) :

$$CI = \frac{\lambda_{max} - n}{n - 1} \quad (式 4-5)$$

计算一致性率 CR:

$$CR = \frac{CI}{RI} \quad (式 4-6)$$

计算出来的一致性率必须要小于 0.1, 否则检测不通过, 其结果不具有可靠性, 需要对专家打分结果进行重新修改, 直到通过一致性率检测。最终各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综合权重	三级指标	综合权重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 (A)	数字化基础设施 (B1)	0.165	主干网与互联网接口带宽 (C1)	0.098
			主干网网络覆盖率 (C2)	0.021
			数据安全措施应用率 (C3)	0.046
	数字化研发 (B2)	0.170	新产品产值率 (C4)	0.104
			R&D 投入强度 (C5)	0.046
	数字化投入 (B3)	0.183	员工人均专利数 (C6)	0.020
			数字化投入占比 (C7)	0.124
			数字化设备投入占比 (C8)	0.041
	数字化人才 (B4)	0.147	数字化运维占比 (C9)	0.018
			数字化技能员工覆盖率 (C10)	0.072
			初级数字化技能人才培养支出比 (C11)	0.029
	业务数字化管理 (B5)	0.168	数字化人才比重 (C12)	0.046
			数字化仓储物流占比 (C13)	0.098
			订单准时交付率 (C14)	0.052
	生产数字化管理 (B6)	0.167	电子商务采购比率 (C15)	0.018
			作业计划自动编制及优化排程的比例 (C16)	0.104
			与 PCS 或 MES 直接相连的数字化设备占比 (C17)	0.040
			数字化检测与监控设备占比 (C18)	0.023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目标组合权重值为:

$$W = (0.165, 0.170, 0.183, 0.147, 0.168, 0.167)$$

(四)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分表

涪陵区民营企业有几千家, 但部分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种类繁多, 为确保评价结果的实用性、代表性, 经询问区统战部、民营经济协会, 综合考虑企业规模、性质、所属行业等方面, 最终从

六大支柱产业中挑选 12 家企业进行调查评分。邀请 8 位专家分别对 12 家企业上述 18 个指标进行打分, 并填写《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调查表》, 对打分结果求取平均值, 结合表 4-2 所求各指标值的权重, 求得 12 家企业的最终得分, 具体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价得分表

	B1	B2	B3	B4	B5	B6	综合得分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78.021	77.346	77.398	76.849	77.526	76.859	77.343
重庆市蓬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76.667	78.180	80.445	76.135	76.455	77.869	77.702
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77.446	77.556	78.455	77.325	77.566	78.356	77.804
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	82.026	81.788	82.756	81.558	82.447	83.136	82.306
重庆美心翼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7.345	77.648	78.788	76.148	77.657	78.356	77.706
重庆万丰奥威铝业有限公司	78.325	79.337	77.689	76.437	77.675	76.548	77.697
首键医药	75.346	76.646	77.846	75.127	76.558	78.566	76.734
葵花药业集团 (重庆) 有限公司	78.879	78.466	79.488	77.637	78.899	78.648	78.702
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	83.759	84.346	83.677	83.645	84.665	83.769	83.981
华通电脑	76.245	77.457	78.566	75.829	76.335	76.423	76.859
华为 (涪陵)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	88.658	88.669	89.083	86.137	86.245	86.766	87.646
互爱科技孵化产业园	75.372	76.487	75.697	75.256	76.346	78.546	76.298

(五) 研究结果分析

根据表 4-2 和表 4-3 可知: 第一, 仅有华为 (涪陵)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的评分高于 85 分, 说明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较好, 事实也是如此。华为 (涪陵)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从事数据管理、智能化管理相关业务, 为涪陵大数据、智能化提供技术支撑, 结论与实际相符。第二, 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得分 80 分以上, 两公司分别从事医药和汽车生产, 从单向指标看, 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

限公司数字化人才得分最低，数字化研发得分倒数第二。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生产、销售、研发一体的企业，但由于涪陵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总量等各方面原因，该公司数字化人才缺乏，难以支撑本企业数字化研发。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也是数字化人才相对缺乏，数字化投入较少。数字化人才相对缺乏也是涪陵所有民营企业的共性问题。第三，其他企业得分均在76-79分之间，总分相差不大，但在各项指标分析中，数字化人才均为得分最低项。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化人才方面的建设和培养。

五、促进涪陵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政府部门引导作用，增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

一是组建数字化转型专项领导小组。为加快推动涪陵民营企业数字化进程，确保企业数字化顺利转型，成立由区委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大数据局、发改委、商务局、科技局、税务局、宣传部、财政局等相关单位，并做好分工各司其职。一方面领导小组建立长效沟通机制，通过制度保障、技术支撑等方式解决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另一方面宣传部做好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对外宣传工作，全方位从思维和理念、技术上打通困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困阻。

二是构建数字化平台和网络，发挥其牵引作用。疫情困扰之下，为助力复工复产，2020年2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要通过协同制造平台整合分散的制造能力，实现技术、产能与订单共享。这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平台，同时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平台。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推动，政府要搭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信息整合平台，并邀请区内各政府部门以及民营企业参与，该网站要按照产业、人才、资源

等进行分类，以便管理和使用，通过该网站整合产业链及产业集群内部资源，促使企业实现产业链各链条数字化转型，最终达到提质、增效、降本的目的。政府要做好信息平台的管理和维护工作，并确保信息平台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准确性。

（二）聚焦数字化转型新突破，加大民营企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

通过研究结论发现数字化研发、数字化投入权重较大，说明加大企业数字化研发、数字化投入有助于民营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一是要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中美贸易战警示我们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拥有核心技术是民营企业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调企业创新地位，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加大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强化基础研究，为企业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提供技术支持。

二是要加大重点领域的研发投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医疗卫生产业更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生物医药是涪陵区六大产业之一，政府和企业要加大该产业领域的研发投入，为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新形势下，疫情加快了数字经济的步伐，为适应新时代新需求，政府和企业也要加大数字化技术相关企业的研发投入，比如华为（涪陵）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的研发投入等。

三是政府做好关键领域关键技术的保障工作。首先在政策上要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畅通通道，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并给企业提供数字化平台、技术、渠道等相关支持；其次，在关键技术、关键领域进行研发投入的企业，政府要给予一定奖励，并为企业融资和手续审批开通绿色通道，多措并举鼓励企业加大数字化研发投入。

（三）强化数字化技术运用，提升数字技术生产管理应用能力

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权重表（表4-2）中，我们发现业务数字化管理和生产数字化管理

两项指标权重接近，都是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指标。民营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根据企业特点侧重生产数字化管理或者业务数字化管理，比如制造业中更加注重生产数字化管理，而服务业中更加注重业务数字化管理，无论生产数字化管理还是业务数字化管理，企业都应做到两点。

一是找准定位。企业“一把手”要准确认知企业自身产业特点以及什么是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不等于网络化，数字化转型将智能运营、主营增长和商业创新三大价值维度统一，是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新枢纽”。因此，准确定位有利于企业对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应用，有利于形成企业新的增长点。

二是善于应用。在浩瀚的竞争中，不进则退是企业经营不得不面临的规则，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表明，全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已经由 2005 年的 49.1% 上升至 80.2%，说明 2020 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企业不得不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冲出困难的有力法宝。涪陵区民营企业同样进行了“上线”以自救，但部分企业由于生产周期长、数字化转型成本高等原因，在生产、经营、渠道、组织、管理等核心环节没有能力进行数字化转型，导致根本不能应对疫情所造成的经营困难。因此，每家企业 CEO 都需要摒弃短期思维，以长期增长为指针，对企业生产、销售等全产业链进行数字化转型，尽早抢占市场先机。

（四）重视数字人才效能发挥，加强民营企业数字人才队伍建设

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价得分表（表 4-3）中我们发现，企业数字化人才指标得分都较低，说明涪陵区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数字化人才。人才是第一发展动力，要加强民营企业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在“引”“育”“留”上下功夫。

一是在“引”上，千方百计充实人才队伍。

首先，要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涪陵区人才办要积极推动“涪陵区网络和大数据智能化人才信息库”的建立，汇集每年来涪应聘人员信息，将有意愿来涪工作而未被录取的人员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及时收集区内外人才信息，并对有需要的企业进行信息分享。其次，创新人才引进模式。采取“引资+引智+引才”模式，完善柔性引才政策，引资与引智相结合，引才与引智相结合，对高层次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采取企业和政府 1+1>2 的模式，全方位引进人才。

二是在“育”上，想方设法提升人才素养。政府引领，提高人才党性素养。抓住党史学习教育契机，积极组织“专家下企业”进行党史教育宣讲，提高网络和大数据智能化人才党性修养。将民营企业中网络和大数据智能化人才纳入统战部重点关注对象，加大该类人才在区委党校每年举办的统战人员培训班中的比例，提升网络和大数据智能化人才政治素养。政企联动，提高人才专业技能。政府每年统计全区人才需求情况，联合长江师范学院和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开展“订单式培养”，由企业出资政府补贴与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签订就业协议，邀请企业实操专家授课，定向培养人才。

三是在“留”上搞创新，竭尽所能留住专业人才。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加强“软激励”的创新，在人才工作、生活、娱乐、教育、医疗、配偶就业等方面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让其安心留涪工作。加大“硬激励”的力度，开展股份分红激励试点，研究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探索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形式。创新人才晋升渠道。坚持“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基本原则，将评价人才的标准体现在有效破解影响区域发展的难题上、体现在引领区域高端产业发展上，拓宽人才晋升渠道，切实保障人才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 [1] 徐晓新,张秀兰.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J].江苏社会科学,2021(1):11-23.
- [2] 李辉,梁丹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路径与对策[J].贵州社会科学,2020(10):120-125.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3).<http://cpc.people.com.cn/2020.11.03>.
- [4] 全国工商联等.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EB/OL].(2020-05-13).<https://www.ndrc.gov.cn/2020.05.13>.
-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EB/OL].(2020-09-15).<http://www.gov.cn/2020.09.15>.
- [6] Barney Tan,Shan L Pan,Xianghua Lu,Lihua Huang.The Role of IS Capabil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Sided Platforms: The Digital Ecosystem Strategy of Alibaba.com[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2015,16(4).
- [7] 唐兴通.在这个不确定时代,数字化转型救命的5个“稻草”[EB/OL].(2017-08-04).http://www.sohu.com/a/162242314_300763,2017-08-04.
- [8] 郭云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二维能力与绩效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2018.
- [9] Kowalkiewicz M, Safrudin N, Schulze B. The business consequences of a digitally transformed economy[M].Shaping the Digital Enterprise. Springer, Cham, 2017: 29-67.
- [10] 张夏恒.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障碍、驱动因素及路径依赖——基于对377家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的调查[J].中国流通经济,2020(12):72-82.
- [11] 王灏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实践评价及启示[J].中国物价,2019(12):79-81.
- [12] Digital Innovation Hubs Working Group 1.Report from the working group meeting on access to finance[R]. Belgium: European Commission,2018.
- [13] 吴非弥.关于用数字经济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建议[EB/OL].(2020-07-31).<https://www.cndca.org.cn/2020.07.31>.
- [14] 徐熠.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20.
- [15] 陈畴镛,许敬涵.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价体系及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20(11):46-51.
- [16] 赵剑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3):3-16.

责任编辑:蒋建忠

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研究

——基于J省的调查

姜 力

摘 要:民营经济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发现,在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力度不够与工作方式方法不当的问题并存,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覆盖面、影响力等方面均有待加强。因此,要结合民营经济的特点,加强和改进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首先,明确各类群体的工作主体,以分层分类的工作主体协同机制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全覆盖;其次,基于民营经济属性,明确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的基本思路;再次,基于“利、情、理、乐”视角加强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

关键词:民营经济;意识形态工作;调查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54-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容纳了全国 80% 以上就业人员、汇集了具有不同群体特征的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以及其他建设者的民营经济领域,理所当然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意识形态工作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本次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122 份,涉及 118 家民营企业。问卷填写者中男性略多于女性,

以企业主或法人代表、管理岗位者居多,占 88.5%; 35-45 岁者略多,占 41.8%; 本科和大专学历者较多,占 63.9%; 中共党员占 36.9%, 群众占 47.5%, 民主党派成员占 11.5%; 在人大、政协、人民团体、社团等有任职经历的占 54.9%。样本企业中,存续时间 10-20 年的较多,20 年以上的较少;从业人数 100 人以上的企业占 40.2%, 100-50 人的占 12.3%, 50-20 人的占 23%, 20 人以下的占 24.6%。

一、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总体来看,被调查者对所在企业意识形态工

收稿日期:2021-09-19

作者简介:姜力,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营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基金委托招标项目(2020JLSKZC004)阶段性成果。

作给予积极评价,54.2%认为很好,33.3%认为较好,11.7%认为一般,0.8%认为较差,无人选择“很差”选项。但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工作力度不够与工作方式方法不当,工作的针对性、覆盖面和影响力有待加强等问题。

(一)民营企业党建群团工作机制不健全

调查问卷涉及118家企业,28.7%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已有企业党组织中,23%不能经常开展活动。有些与上级党组织是松散的挂靠关系,没有形成有效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在人员配备方面,14.9%的企业党组织没有专职党务工作者,甚至规模较大的企业也没有专职党务工作者。一些党务工作者责任心不强、业务不熟,不愿抓不会抓党务工作,59%的问卷填写者认为党务工作者业务水平不足;受雇于业主的党组织负责人缺少话语权,缺少权威和号召力。在活动经费方面,经费保障缺少硬性约束,12.6%的企业党组织没有活动经费。虽然中央要求将党建费纳入企业管理费用,建立税前列支和党费拨返制度,并鼓励企业赞助、党员自愿捐助等方式解决经费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落实难度大。在党建工作覆盖方面,没有形成党建带群团的工作格局,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向非中共群体延伸,37.3%的企业没有建立工会组织,建立工会的企业中,14.7%的企业开展文化娱乐活动频次不高。

(二)企业党建横向联系不宽泛

20%的企业与当地党组织、工团妇等群团组织联系很少或没有联系。与统战部及其所属社团很少联系或没有联系的个人占13.5%;在密切联系者中,6.3%的个人认为对其意识形态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与工商联很少联系或没有联系的个人占10.1%;在密切联系者中,14.3%的个人认为对其意识形态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税务、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虽然与企业有密切的工作联系,但43%的个人认为税务、市场监管等有关政府部门对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或没有影响。

(三)工作流于简单化表面化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重“务虚”轻“务实”、重“形式”轻“内容”、重“高大上”轻“接地气”、重“单向灌输”轻“双向互动”的问题,把意识形态工作看成单向的“我说你听”的工作。只讲主体要求,不讲客体需要,撇开个人价值而孤立地、抽象地讲社会价值,不关注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不贴近人们的思想实际,不贴近人们的生活工作实际,不贴近企业的生产经营。

(四)新媒体技术运用不够充分

多数企业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陈旧僵化、内容单调、形式单一,缺乏有力抓手,习惯于企业党组织开会学文件、上党课等传统形式。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活动还不多,内容不够生动丰富,缺乏吸引力。问卷调查中,关于“怎么看待目前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方法”,13.7%的问卷填写者选择“方式方法陈旧僵化”,12%选择“内容单调、形式单一”和“缺乏有力抓手”,1.7%选择“脱离实际、流于形式”。关于“企业党组织经常以什么样方式开展活动”的多项选择题目,90.5%的问卷填写者选择“集体学习”,54.8%选择“文化娱乐活动”,40.5%选择“参观交流”,38.1%选择“专题讲座、论坛”和“谈心谈话”,29.8%选择“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25%选择“网络线上活动”。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涉及有关部门和企业主的重视程度、企业主或法人代表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企业存续时间、从业人员数量、企业党组织是否有专职党务工作者和活动经费、地方党组织与企业的联系程度、当地工团妇等群团组织与企业联系程度等等。其中,思想上重视不够是根本原因。有关方面囿于民营经济的属性,对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党委政府部门认为民营经济实体是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领域,抓不住也抓不好,还不如把工作重点放在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部分企业主对意识形态工作采取敷衍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

形态工作占用人力物力和时间，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做好生产经营才是头等大事。

二、加强和改进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思路

民营经济领域有别于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首先，民营经济领域的个人发展机制、利益机制不同于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除了少数民营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数人的发展空间和利益所得与个人意识形态取向没有明显关联。其次，资本的民间性和经营的自主性，决定了企业主以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首要目标，企业主的个人素质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态度，成为其内部能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工作成效如何的重要因素。第三，尽管民营经济实体或个人与一些部门有着工作联系，但民营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导致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缺位。因此，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照搬国有企事业单位模式，要结合自身领域特点做到“适宜”，达到思想的统一、人心的凝聚。

（一）以利益认同激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利益是人们永恒不变的原始驱动力，利益是思想的基础，是政治活动的目的、内容和本质，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和根本动力。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 问卷统计结果也显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个人收入满意度有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强调集体主义价值的引导，又不能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借口无视个人正当利益。要在维护满足个体正当利益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在利益追求中做到义利并重，义利统一。

（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除了利用公开手段或公共组织系统的显性教育外，意识形态工作也要“隐形化”，从外部的硬灌输变为内外结合的软灌输。不刻意标榜宣传，把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核心要素隐含在具体事件、叙事情节和表述符号中，渗透到

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从而规避受众的心理抵抗和心理逆反，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

（三）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其他工作之中

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孤立的，不应该就意识形态工作而做意识形态工作，要与其他工作相融合。要融入统战部、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工作中，要融入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政府部门对民营经济的监管和服务工作中，要融入企业文化建设、经营管理中。

（四）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协同开展

民营经济领域集中了众多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战工作对象，开展这些人尤其是代表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涉及与统战工作协同的问题。意识形态工作与统战工作在工作内容、任务方面各有侧重，工作对象与方式方法也有所不同^[2]。但是，二者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了凝聚人心。因此，要将两者贯通起来，一起谋划、一起部署，相互促进。通过意识形态工作，提升统战工作对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培养更多政治上可靠的党外人才，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把更多的人心凝聚起来；通过统战工作，多了解、关心和帮助他们，及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调动他们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他们积极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为意识形态工作出计献力。

三、基于工作对象分类分层视角完善工作主体协同机制

民营经济领域人员构成复杂。从岗位职责看，包括民营经济人士、管理技术人员、普通从业者等群体；从政治面貌看，包括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成员、普通群众；从统战工作对象看，包括不同层级的代表人士、一般统战工作对象、非统战工作对象。对这些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做到不留死角并有针对性，有必要对工作对象分类分层，既要关注民营经济人士，又要重

视管理技术人员、普通从业者；既把中共党员、民营经济人士、代表人士作为重点，又不忽视其他成员。同时，还要调动多方面工作主体参与，确保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全方位推进。这些工作主体应该包括：组织、宣传、统战等党委部门，工商联、工会、共青团、妇联、青联等群众团体及有关社团，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与民营经济有联系的政府部门，另外还包括民主党派、民营经济领域党组织和工会、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等。这些工作主体日常职责差异很大，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并非它们的主要职责，但工作主体部门应当要有所作为、有所侧重、有所分工、有所协作。

（一）代表人士意识形态工作主体

代表人士与地方党委统战部、有关政府部门、工商联等人民团体有着密切联系，沟通交流方便，这些部门适合主导代表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另外，民主党派、社会主义学院等方面也能够协助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可以协助统战部、工商联开展集中的政治培训。调查问卷统计显示，绝大部分人士表现出较高的集中政治学习意愿。关于“政治学习和培训活动是否有必要”题目，选择“有必要”的为98.4%，选择“意义不大”的仅为2.1%。

（二）非代表性民营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

工商联联系众多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会员，市场监管、税务部门通过其基层组织联系着绝大多数民营经济人士，这些部门有条件在其他主体协助下主导民营经济人士的意识形态工作。调研发现，工商联与民营经济人士互动多，而且对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对半数左右人员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

（三）非代表性的管理技术人员、其他普通

从业人员及中共党员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

民营企业党组织、工会是所有管理技术人员和其他普通从业人员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主体，要落实主体责任，掌握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另外，民主党派要关注其民营经济领域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宣传部要深入企业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组织部联系党校对中共党员尤其是企业党组织成员开展集中的政治培训，当地工团妇等群团组织可以在企业内外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

民营企业党组织要以党建带群建，把企业党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建设和有机结合起来，聚焦企业主、员工、党组织三方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与企业发展的同频共振，与员工互促共赢。首先，加大企业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力度。根据企业情况，可以采取单独组建、派员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模式。对于单独组建的党组织，为了减少企业党群工作成本，以及企业党群工作与生产经营两张皮问题，工作人员以兼职为主、少量专职，党组织班子成员和企业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使党的政治领导与企业法人治理相互融合，发挥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第二，配强高素质党务工作者。按照政治立场坚定，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本领的标准，通过内部选举、组织选派、公开选聘等方式，选优配强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建指导员。第三，建立多渠道党建工作经费筹措机制。督促企业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理费用列支，按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把企业党建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专项列支制度；落实党费返还支持政策，各级留存党费每年要按照一定比例，以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的形式支持企业党建工作^[3]。

四、基于“利、情、理、乐”视角加强和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心的工作，人的心态与利益有关，与情感、理性、氛围有关，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得法。如果方法不对路，会导致

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为增强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要从以利惠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寓教于乐的角度开展意识形态工作。

（一）以解决企业和个人的实际问题凝聚人心

意识形态工作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但思想认识问题往往与个人生活工作中的现实问题相联系，相当一部分思想认识问题是由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引起的。因此，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搞空头政治，既要关注工作对象的思想状况，也要关心其工作生活中的困惑，了解其愿望要求，力所能及地为其排忧解难，让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在民营经济领域履行本职工作职责时，要积极为各类经济实体或员工服务，协调各种关系。企业党群组织更要在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关爱员工、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凝聚人心。

（二）以政治角色安排和评比表彰激励人心

推荐更多优秀人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重要角色，以政治参与激励政治认同。民营经济领域集聚了大批能人贤士，一些人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参政愿望。调查问卷显示，53.3%的问卷填写者有强烈参政意愿，无人表示不愿参政。其中，63.8%的企业主或法人代表有强烈意愿，48%的管理岗位人员有强烈意愿，22.2%的技术岗位人员有强烈意愿。如果因势利导，推荐更多政治上先进、形象上良好的民营经济人士在社会政治领域担当重要角色，将其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纳入现有政治体系中，不仅有利于提高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能力，还会激发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要让更多优秀人士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在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和官方半官方的社团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或出任特约监察员、特约监督员、行风评议员等。

通过优秀人物的典型示范宣传，激励更多的人认同践行主流意识形态。模仿是一种最富感染力的生成认知、陶冶情感、增强意向的有效途径。

榜样、精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践行，不仅是一种理论的“教化”力量，还是一种重要的“感化”力量^[4]，人们通过对榜样、精英言行的观察、仿效，也会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调查问卷也显示，46.7%的人认为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对其意识形态影响大，51.2%的人希望党组织经常以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的方式开展活动。因此，要加大力度树立群众信任的榜样，利用各种媒介广泛宣传群众身边的典型，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氛围。

（三）以真诚亲和的态度和话语方式打动人心

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亲和力。意识形态工作是人情味很浓、艺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人要讲感情，说话要讲艺术，这样才能缩短心理距离，达到感情的融洽和思想的共识。因此，意识形态工作者不能以领导者、教育者身份自居，不能自认为高人一筹、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要淡化权力意识，淡化单向灌输，增强双向互动交流，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以感情的交流换取思想的相通，扩大共识，感召人们自觉地提高思想认识。

要讲真话、讲实话，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公信力。要淡化刻板空洞说教，言之有物。可以围绕国情、社会热点问题、与人们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等，讲接地气的“大实话”“通俗话”，运用故事、数据和鲜活案例，深入浅出地把“大道理”讲实、讲透、讲明白^[5]。

（四）以丰富多彩的新媒体内容和文化娱乐活动吸引人心

工商联和企业要重视新媒体平台建设。调查问卷显示，65.3%的被调查人员经常浏览官方微信、关注官微发布的消息，87.6%的问卷填写者将“新媒体”作为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渠道。这是因为新媒体的信息传播范围广、容量大，拓展了人们在闲暇时间接触主流意识形态的时空与渠道，可以就某个问题热烈地交流互动，从而能够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广度、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

厚度。工商联和一定规模的企业要重视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新媒体平台建设,打造成宣传、服务、交流的平台。宣传民营经济在党和政府支持下的成就和贡献,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宣传解读民营经济政策及保障从业人员权益的政策。工商联要提供生活服务、招聘和产品供求等方面的信息,汇集民营经济实体和员工的各类诉求。另外,工商联和企业的新媒体平台,还要成为人们思想互动交流的平台、文化娱乐活动的载体,使意识形态工作引人入胜。

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能够将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内容转化为受教育者参与的活动之中,在活动中发挥出主导作用,在组织或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将教育目的作为自我教育目标^[6]。因而,对个人意识形态有很大影响力,人们也有所期待,如在“希望企业党组织经常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活动”的多项选择题目上,有65.1%选择“文化娱乐活动”。但是,这类传统活动在民营经济领域开展的频度并不高,而且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和审美疲劳,吸引力有所减弱,因此,文化娱乐活动方式要与时俱进。可以借鉴商业营销做法,贴近受众者心理,通过网络、电视或现场方式,围绕主流意识形态和生产经营等方面,举办民营经济领域的知识竞赛、辩论赛、诵读大

赛、红歌赛、征文等有奖娱乐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走深走实走心。

总之,意识形态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多方面工作主体既要以利惠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寓教于乐,还要意识形态工作者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做认同和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率,靠人格魅力产生感召力和影响力,使教育对象从心理上敬佩、信服和信赖,进而自觉自愿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 [2] 叶昊,郭文龙.构建统战与意识形态工作协同机制[N].广西日报,2019-5-16(08).
- [3] 刘刚.非公企业党建难点问题及其破解对策——基于河南省的调查与思考[J].中州学刊,2018(10):36.
- [4] 苏曦凌.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分析——基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路径[J].学术论坛,2010(2):41.
- [5] 罗仲尤.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路径[N].光明日报,2015-8-23(07).
- [6] 李辉,王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的现实审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4.

责任编辑:蒋建忠

新生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祝 阳

摘 要:新生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迫切需要,也是助力该群体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认知、意向、行为、情感四个维度,运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展开研究。同时,本文还从网络空间、现实空间两个“场”,探讨在新生代海外侨胞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关键词: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60-11

“新生代”是一个具有一定年龄限定的概念,也是一个体现“因代际差异而导致行为差异”的概念。本文“新生代海外侨胞”中的“新生代”,将年龄范围控制在35岁以内,包括“85后”“90后”及“00后”。尽管“85后”“90后”“00后”在心理及行为上存在差异,但仍然可以大致刻画他们的共性“群像”。对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进行调查,可为铸牢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现实参考。

一、研究方法及样本特征

(一) 实地研究与统计调查相结合

本文对特定的“新生代海外侨胞”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北京邮电大学侨联、北京师范大学侨联、北京理工大学侨联、北京交通大学侨联、中央财经大学侨联、中

美联合会、海淀区侨联等机构发放问卷;同时,通过熟人关系将问卷链接发放给居住在国外的侨胞,并通过留学的朋友在国外发放问卷。以问卷填写的IP地址排除非“海外”,通过回答第一道问题“您的年龄”,去掉答题人年龄大于35岁的问卷,最后筛选出同时符合“海外”“35岁以下”“长期定居、而非留学与短时间暂住”的问卷,共计237份。在此基础上对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进行分析。

(二) 文献调查法

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并充分利用中国期刊网的资源,对相关信息和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与整理,深入了解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同时,搜集相关工作报告、内部数据等二手材料。对搜集到的上述资料展开质性分析。

收稿日期:2021-10-10

作者简介:祝阳,管理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导,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与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中国梦视域下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研究”(KT202110)的部分成果。

（三）访谈法与质性研究法

通过腾讯会议、个案访谈的方式，对10位新生代海外侨胞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政策等方面的认同感。

（四）样本特征

第一，选取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汉语水平四个指标，描述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表1 被调查者个人基本信息 (N=237)

	选项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125	52.74%
	女	112	47.26%
宗教信仰	有	110	46.41%
	无	127	53.59%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包括在读)	40	16.88%
	大学	139	58.65%
	研究生	51	21.52%
	博士	7	2.95%
汉语发音与交流	很流畅	157	66.25%
	很一般	45	18.99%
	比较差	35	14.76%

第二，调查对象原籍的民族情况

表2 被调查者原籍的民族分布状况 (N=237)

民族	频数	占比
汉族	111	46.84%
哈萨克族	7	2.95%
蒙古族	8	3.38%
柯尔克孜族	2	0.84%
满族	34	14.35%
白族	3	1.27%
回族	13	5.49%
苗族	17	7.17%
壮族	19	8.02%
侗族	12	5.06%
不清楚	11	4.63%

第三，调查对象的原籍所在省份情况。

表3 被调查者原籍所在省份 (N=237)

省份	频数	占比
福建	48	20.25%
广西	41	17.30%
广东	48	20.25%
云南	20	8.44%
北京	39	16.46%
上海	5	2.11%
辽宁	6	2.53%
四川	6	2.53%
湖北	8	3.38%
天津	7	2.95%
重庆	1	0.42%
不清楚	8	3.38%

第四，调查对象的现居住地情况。

表4 被调查者现居住地 (N=237)

国家或地区	频数	占比
印尼	31	13.08%
泰国	24	10.13%
美国	60	25.32%
新加坡	21	8.86%
英国	29	12.24%
加拿大	18	7.59%
意大利	17	7.17%
秘鲁	3	1.27%
日本	18	7.59%
韩国	16	6.75%

需要说明的是，“新生代海外侨胞”这一研究对象的抽样具有一定难度。鉴于抽样方法与能接触到的研究对象有限，样本特征与总体特征仍具有一定的偏差，可能抽取的对象也具有一定的人口特征，调查结果仅能保证在一定范围内有解释力。

二、新生代海外侨胞的群体特征

海外侨胞主要聚集于东南亚国家及北美国家。据统计，海外侨胞人数已达到6000多万，分布于世界198个国家与地区。人数排名前十的国家：印度尼西亚超1000万、泰国约1000万、马来西亚740万、美国508万、新加坡298万、加拿大177万、缅甸163万、菲律宾135万、秘鲁130万、澳大利亚121.4万。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离不开团结海外侨胞。新生代海外侨胞是海外侨胞中年轻的群体，代表了海外侨胞群体未来的发展方向，厘清新世代海外侨胞群体的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具有典型的“网生代”特征

新生代海外侨胞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网络较为频繁，该群体是典型的“新新人类”，是名副其实的“网生一代”。他们具备较高的网络使用技能，能快速学习并使用各种网络产品，也习惯通过网络搜索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对网络较为依赖，网络成为新生代海外侨胞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工具。一方面，网络令新生代海外侨胞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加丰富多彩，他们是网络的受益者。另一方面，网络容易导致人出现“异化”等问题。例如，出现沉溺于网络、无法分辨信息真假等现象。因此，新生代海外侨胞也易受不良信息的影响。

（二）“香蕉人”与“芒果人”并存

学界曾将海外侨胞形象地比喻为“香蕉人”与“芒果人”，两者的差异在于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芒果人”是指深受中华文化熏陶、依然具有中国人心理特征、对中国依然具有较强情结的海外华人或华侨。“香蕉人”是指因长时间生活在海外，基本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对中国没有太多情感、也不具备中国人共同心理特征的海外华人或华侨。在新生代海外侨胞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香蕉人”存在。他们自出生就成长、生活在异国他乡，并未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到的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也多是居住国的教育，因而对中国了解程度低、投入的真情实感少。他们对中华文化更多的是好奇感，而缺少归属感。另一方面，“香蕉人”在成长过程中，从父辈或祖辈那里接收到的中华文化及中国家乡发展的信息较少，缺少相应的家庭文化氛围熏陶。家庭生活被西化或被当地文化同化，因而形成了“香蕉人”的特征。同时，新生代海外侨胞中也存在相

当比例的“芒果人”。他们虽然居住在国外，但其成长环境多是“唐人街”“华人区”，家庭生活依然保留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一群体对中国依然具有较浓厚的情感，他们更关心祖国的发展，认为祖国与自身命运休戚与共。

（三）受教育程度好、未来成功的可能性高

新生代海外侨胞的祖父辈或父辈已经移居海外，并具有较多的资本积累，他们的家境都比较殷实，成长过程中通常具有较好的物质保障。新生代海外侨胞的父母更加关注教育问题，能够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相当比例的新生代海外侨胞已经进入大学，攻读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相当比例的新生代海外侨胞正在或曾经在私立高中读书。新生代海外侨胞的长辈在当地社会地位通常较高，家庭的背景、财富、人脉等为新生代海外侨胞提供了相对多的社会资本，这些都为他们未来事业发展及生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在步入社会后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具备的社会影响力也会更大。

（四）受到居住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同熏陶

新生代海外侨胞深受居住地文化的影响，同时也难以割断与中国的血脉联系，不同程度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成长过程受到这种双重影响，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对多元文化表现出较为包容的态度，并不排斥某一种文化。新生代海外侨胞面临多元文化，同时也面临多种价值观的选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出现冲突甚至产生激烈斗争时，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新生代海外侨胞不知如何选择，处于一种迷惘的状态。在此情形下，如何让新生代海外侨胞更加认同中国文化及中国主流价值观，是一个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三、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调查

“知”“意”“行”“情”共同构成了个体的心理结构。所谓的“知”指的是认知，所谓的“意”指的是意向，所谓的“行”指的是行为，所谓的

“情”指的是感情，它们能全方位反映个体对某项观念的认知与行为。本文从上述四个方面展开调查，了解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

(一) 知：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现状

1.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的认知

您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包括哪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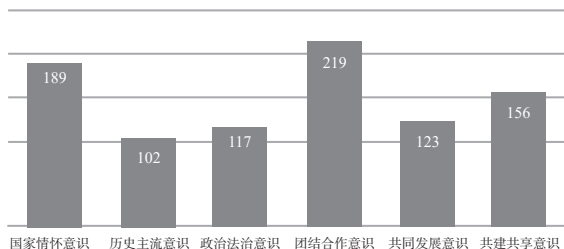


图1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的认知

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的认知较为多样。79.7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国家情怀意识”，43.0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历史主流意识”，49.37%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政治法治意识”，92.41%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团结合作意识”，51.9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共同发展意识”，65.82%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共建共享意识”。其中，选择“团结合作意识”的占比最大，说明新生代海外侨胞希望与中国各族人民精诚合作、凝心聚力，建设好伟大祖国；选择“国家情怀意识”的占比次之，说明新生代海外侨胞具有较浓厚的国家情怀意识，认为“国”与“家”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体现出较强的“中国人”意识。

2.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涉及领域的认知

您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涉及领域包括哪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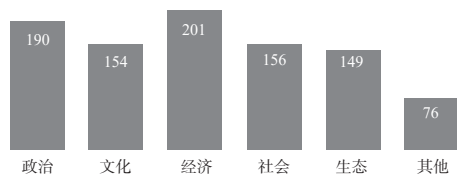


图2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领域的认知

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涉及到的领域，调查结果的排序为：经济（84.81%）、政治（80.17%）、社会（65.82%）、文化（64.98%）、生态（62.87%）。这说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层面进行努力。

3.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理解尚需加强

您是否了解“多元一体”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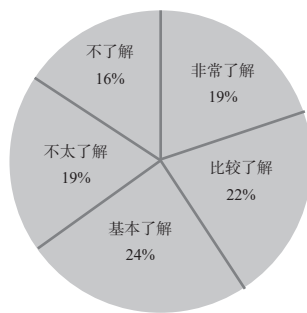


图3 对“多元一体”的了解

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理论的认识有待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次理论内涵是“多元一体”。对此，仅有19%的调查对象表示非常了解，22%的调查对象表示比较了解，有19%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太了解，还有16%的调查对象表示完全不了解。这说明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还处于浅层次。

4. 总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正面评价

您觉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根本上表达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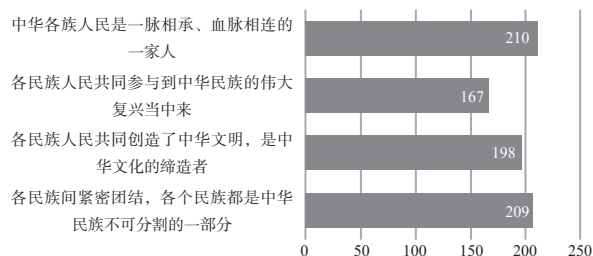


图4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根本表达的认知

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正面评价。88.61%的调查对象选择“中华各族人民是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的一家人”，88.19%的调查对象选择“各民族间紧密团结，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3.54%的调查对象选择“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是中

华文化的缔造者”，70.46%的调查对象选择“各民族人民共同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祖国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的意义重大。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表 5 回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客观题的情况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110	12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	109	128
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要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	111	126
五个认同内容是指“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69	16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共建中华民族，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50	87
共享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包含 56 个民族的文化，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共有的精神家园	139	9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126	11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116	121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状况，本文设计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选择题。结果显示，多数题目回答正确率低于 50%。由此可见，新生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需加强，还需进一步引导他们加强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二) 意：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向现状

1. 对多元的民族文化包容程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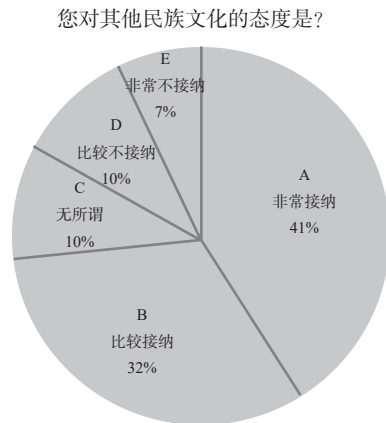


图 5 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程度

新生代海外侨胞对民族文化的接纳程度较高。41%的调查对象表示非常接纳，32%的调查对象表示比较接纳。这反映出他们对多元民族文化的包容程度较高。

2. 民族文化差异并不会严重影响个人社会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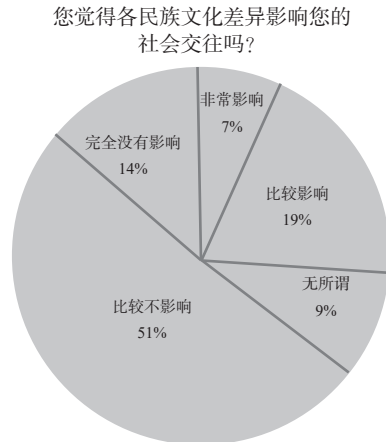


图 6 民族文化差异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民族差异的存在对个人的社会交往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认为非常有影响的仅占 7%，比较影响的占 19%。在相关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表示，其他民族同胞与自己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需要尊重别人的民族习惯。同时，他们认为，基本不会因为对方的其他民族身份而影响相互间的社会交往。

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自身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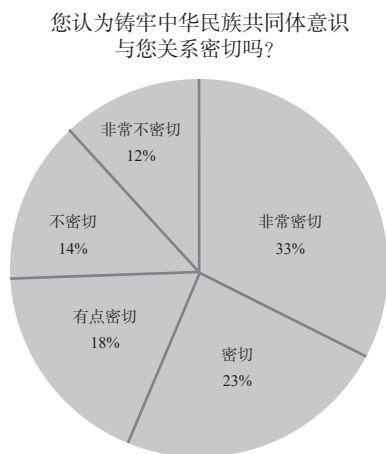


图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自身的关系

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个人密切相关。其中，33%的人认为非常密切，23%的人表示密切。另有14%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密切，还有12%的调查对象表示非常不密切。这表明，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4.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较强的行为意向

- 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她所取得的成就，我感到自豪。
- 当我遇到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会制止。
- 我乐于坚持各民族团结互助，愿意与各族人民合作交往。
- 我希望未来的工作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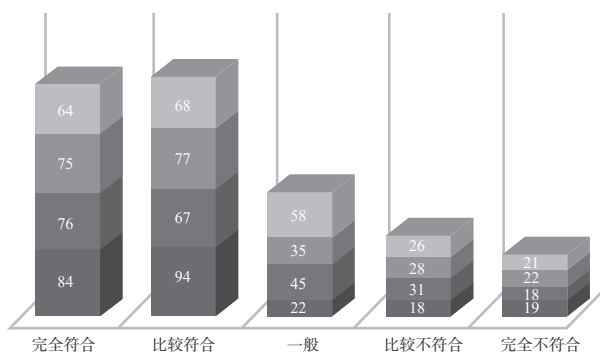


图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意向

新生代海外侨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为意向较强。调查显示：“我希望未来的工作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均值为

3.87，“我乐于坚持各民族团结互助，愿意与各族人民合作交往”的均值为3.64，“当我遇到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我会制止”的均值为3.65，“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她所取得的成就，我感到自豪”的均值为3.54。^①上述结果表明，在捍卫祖国利益、为祖国建设发展贡献力量、为民族团结做出努力等方面，调查对象的行为意向较为强烈。

(三) 行：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为现状

1. 对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尚需提高

表6 了解少数民族政策的程度

	完全了解	比较了解	一般	不太了解	完全不了解
少数民族干部政策	17	34	112	70	4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政策	57	64	44	47	25
发展民族教育文化事业政策	66	67	51	31	22
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政策	34	54	87	36	26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	87	76	43	20	11
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70	69	55	41	2

少数民族政策的知晓度尚需提高，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对国家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的知晓程度不够。调查结果显示：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方面，均值为3.56；在“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均值为3.40；在“发展民族教育文化事业政策”方面，均值为3.24；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政策”方面，均值为3.07，在“少数民族干部政策”方面，均值为2.81；在“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政策”方面，均值为2.92。国家针对少数民族颁布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政策，是建立在党和国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前提之上的，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关怀的重要体现。这需要加大宣传，让新生代

注：①为了全面了解情况，计算各选项的均值(x)，计算方法如下：完全符合=5分、比较符合=4分、一般=3分、比较不符合=2分、完全不符合=1分，加权求均值。本文中涉及的“均值”均按该方法计算。

海外侨胞充分了解相关政策，真正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2. 网络平台及自媒体成为了解少数民族政策的主要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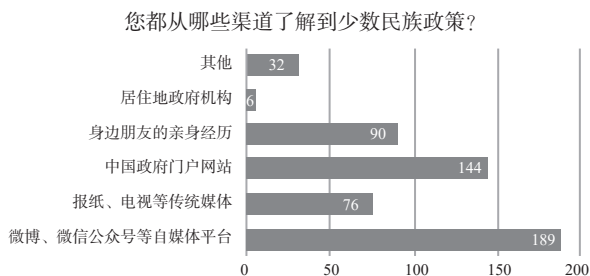


图 9 了解少数民族政策的渠道

新生代海外侨胞对少数民族政策了解渠道呈现多元化方式，网络成为主要手段，中国政府网站成为主要官方渠道。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成为新生代海外侨胞了解国家政策的主要渠道。调查显示：在媒介使用方面，有 79.75% 的人选择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有 32.07% 的人选择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信息来源方面，有 60.76% 的人选择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有 37.97% 的人选择身边朋友，有 2.53% 的人选择居住地政府机构。新生代海外侨胞成长、居住在国外，无法接受国内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对他们的相关教育通常依靠长辈。除此以外，他们往往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来获取相关信息。因此，在网络空间及自媒体平台上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必要。

3. 网络平台与长辈讲述成为了解祖国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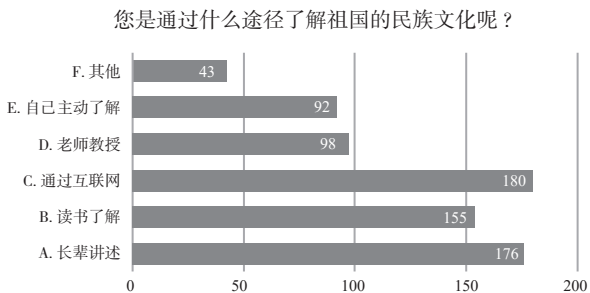


图 10 了解祖国民族文化的途径

深入了解祖国民族文化是建立深厚的中华民

族情感的前提，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了解途径体现出线上与线下充分结合的特征。通过长辈讲述了解相关内容的被调查者占 74.26%，这反映了第一代海外侨胞对新生代海外侨胞的影响；通过各类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书籍了解的占 65.40%；通过互联网了解的占 75.95%，这表明互联网是新生代海外侨胞了解祖国民族文化的最主要途径，也反映出他们“网生一代”的特征。另一方面，主动了解祖国民族文化是具有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体现，新生代海外侨胞居住在异国他乡，对祖国文化仍旧存在着一定的好奇感，仍然具有了解祖国民族文化的动机。在被调查者中，自己主动了解的占 38.82%，占比并不高，这也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需做大量的工作。

4. 通过线上线下多元途径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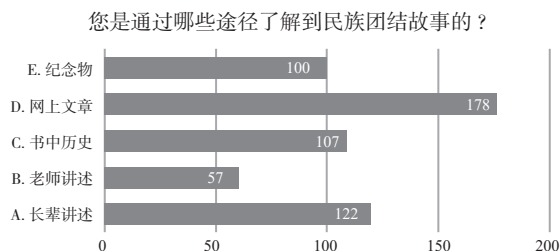


图 11 了解民族团结故事的途径

调查显示，在了解民族团结故事的各种途径中，长辈讲述占 51.48%，老师讲述占 24.05%，书中历史占 45.15%，网上文章占 75.11%，纪念物占 42.19%。在异国他乡，一些新生代海外侨胞通过“孔子学院”的讲座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民族团结的故事；也有一些新生代海外侨胞通过相关展览间接了解中国民族团结的故事；而网络则是他们了解民族团结故事的重要途径。在本研究的相关访谈中，受访者表示，会看两类网络文章。一类是中国人撰写的文章，另一类是外国人撰写的文章，后者的内容有时会让人难辨真假，影响对相关内容的价值判断。

5. 网络是了解民族节日的最主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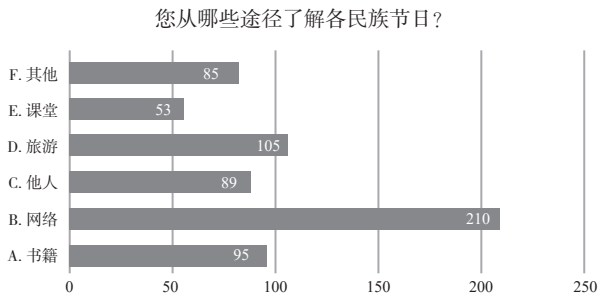


图 12 了解民族节日的途径

网络成为新生代海外侨胞了解民族节日的主要途径。在被调查者中，从书籍里了解民族节日的占 40.08%，在网络上了解的占 88.61%，通过他人了解的占 37.55%，通过旅游了解的占 44.30%，在课堂上了解的占 22.36%。可见，网络是了解民族节日、了解祖国的重要渠道，而通过课堂能够了解的相关信息并不多，这与他们主要是接受西方学校教育有关。在相关访谈中发现，少数国外教师在课堂上有丑化华人、丑化中国政府的言论，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对此比较反感，但依然有少数新生代海外侨胞会被误导。

6. 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多元化

您从哪些途径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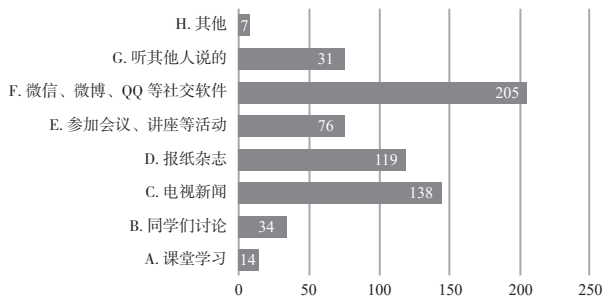


图 13 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在被调查者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方面，从课堂上了解的占 5.91%，通过同学间讨论了解的占 14.35%，从电视新闻中了解的占 58.23%，从报纸杂志上了解的占 50.21%，在会议、讲座等活动中了解的占 32.07%，通过微信、微博、QQ 等社交软件了解的占 86.50%，听其他人说的占 13.08%。可见，接触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是新生代海外侨胞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途径，而他们通过人际传播、课堂学习、同学间讨论等途径了解相关信息的比例并不高。

(四) 情：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现状

1. 对中国依然有较浓厚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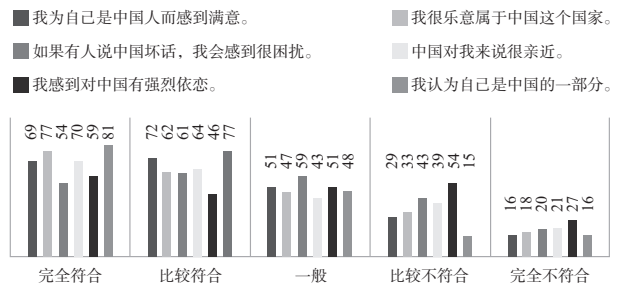


图 14 对中华民族的感情状况

在对中华民族的感情调查中，“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满意”的均值为 3.63，“我很乐意属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均值为 3.62，“如果有人说中国坏话，我会感到很困扰”的均值为 3.36，“中国对我来说很亲近”的均值为 3.52，“我感到对中国有强烈依恋”的均值为 3.24，“我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均值为 3.81。上述结果显示，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国具有较强的感情，身在异乡却仍然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伟大成就，这让新生代海外侨胞逐渐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他们更加看重“中国人”的身份，对“中国人”的身份产生较强的认同感。

2. 对中华民族具有较高的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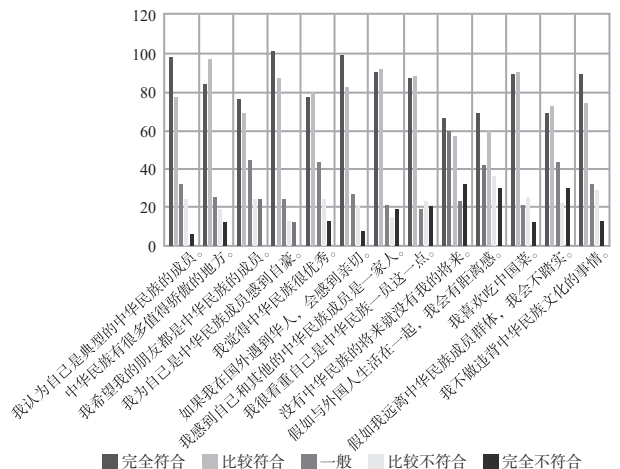


图 15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情况

有关中华民族认同感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

海外侨胞具有较高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我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华民族的成员”的均值为 4。此项均值最高,说明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有一颗热爱祖国的“中国心”。“中华民族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的均值为 3.94。新生代海外侨胞依然关心祖国的发展,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祖国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奋斗的历程,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依然认同祖国,并以祖国为傲。“我希望我的朋友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的均值为 3.63。这可以看出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希望身边亲近的人也都是“中国人”。“我为自己是中华民族成员感到自豪”的均值为 4.06,“我觉得中华民族很优秀”的均值为 3.78,这两项指标也进一步印证新生代海外侨胞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处于较高水平。“如果我在国外遇到华人,会感到亲切”的均值为 4.03,“假如与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我会有距离感”的均值为 3.35。在异国他乡见到与自己一样拥有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同为一类人的亲切感,而更愿意同华人亲近,体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具有较强的归属感。“我感到自己和其他的中华民族成员是一家人”的均值为 3.92。这表明,“家”与“国”在新生代海外侨胞的心里是两个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们表现出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意愿。“我很看重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这一点”的均值为 3.84。可见,新生代海外侨胞对“中国人”的身份非常看重,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引以为豪的标签,对“中国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没有中华民族的将来就没有我的将来”的均值为 3.44,“假如我远离中华民族成员群体,我会不踏实”的均值为 3.54。可以说,新生代海外侨胞把自己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从心底深处认为祖国是自己未来发展的最坚强后盾。“我不做违背中华民族文化的事情”的均值为 3.83,体现了多数新生代海外侨胞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祖国形象的立场。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知”“意”“行”“情”

等方面的调查中,我们依然发现一定比例(不占多数)的新生代海外侨胞具有典型的“香蕉人”特征。他们在认知、意向、行为、情感上,对中国文化、“中国人”身份、中华民族都缺乏浓厚感情,极个别调查对象出现负面言论。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有相当比例的新生代海外侨胞出生、成长在国外,当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家庭教育时,会感受不到祖国文化与祖国发展的伟大成就。又如,在国外学校就读,容易受到课堂教育的误导,尤其是面对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容易迷失自我。此外,网络空间的信息庞杂,各种社会思潮都会以各种形式影响新生代海外侨胞。

四、铸牢新生代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面临的挑战

(一)在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

网络成为新生代海外侨胞了解中国的最主要渠道,网络空间也很自然地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领域。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网络空间具有去中心化、信息过载、传播速度快、波及面广、形式多样、内容碎片化等特征。这些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诸多挑战。

1. 虚拟化交往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

相较于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增大。虚拟化的交往过滤掉个体的民族、性别、学历等信息,交往对象的信任程度被削弱,不信任的环境冲击了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网络社会群体利益多元、诉求多样,非面对面的交往导致利益冲突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更大,也无形中增加了现实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化解利益冲突需要消耗较多的人力物力成本,无形中增加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难度。

2. 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致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网络环境复杂

当前,网络领域是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的领

域,是争夺人心的重要阵地。西方各股势力通过多样化的网络渠道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导致部分群体思想混乱,也对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产生负面影响。网络传播具有传播速度裂变性、传播方式隐秘性、传播影响广泛性等特征,致使西方意识形态能以隐秘化、碎片化的信息形式存在,直接冲击受众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相对复杂的网络传播环境有可能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温床”,影响甚至威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3. 非理性网络舆论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利因素

网络已成为传播民族话题的重要平台,其中既包含促进民族团结、利于民族发展与繁荣的“正能量”信息,也存在损害民族利益、危害民族团结的非理性舆情风险。网络媒介环境中多样的舆论交织,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未必能得到保证,涉及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非理性舆论信息会被国际、国内社会广泛关注,易激发民族情绪,甚至引发民族群体极化行为,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1]。可以说,涉及民族的非理性舆论会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埋下“隐患”。

4. “去中心化”传播形态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受众判断力

网络时代,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信息传播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传播内容也由传统时代单一化的内容向多元化的内容转变,进而形成“去中心化”的态势。网络空间“去中心化”传播,意味着传播内容的多样化、受众的选择多样化。以往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供给,受到多元意识形态涌入的冲击。在此情形下,如何让受众选择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抵制其他意识形态的诱惑,成为值得深思的新问题。网络时代多数受众对舆论具备一定的辨别能力,能够分辨是非,但依然有部分受众面对复杂的信息,无法有效辨识真伪。

(二)在现实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

关于促进民族团结的影响因素,
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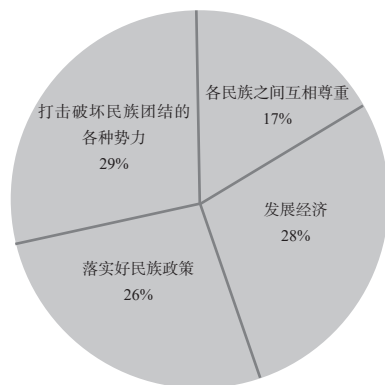


图 16 促进民族团结的影响因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本研究就促进民族团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7%的被调查者认为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28%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发展经济,26%的被调查者认为要落实好民族政策,29%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打击破坏民族团结的各种势力。上述调查也反映出,在现实世界中仍然存在诸多可能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首先,意图破坏民族团结的势力依然存在。境内分裂势力依然存在,西方反华势力也企图用各种方式来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危害中国社会的稳定。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空间,这些势力从未停止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其次,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诸多问题,也会影响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再次,对民族政策的宣传与落实不到位,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不利影响。最后,各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若相互了解、理解不够,便容易造成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隐患。

参考文献:

- [1] 王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网络民族舆论价值取向的逻辑及路径[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15-19.

责任编辑: 吉强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路径与对策研究

徐 清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文化“送出去”为主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要求,要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以“卖出去”为主的市场化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建议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重构全球文化产业链,集聚和整合全球文化资源,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打造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平台和合作交流机制,建设文化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平台,培育和发展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企业,培养懂文化、善经营、会外语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并推动中介服务机构同步“走出去”。

关键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文化产业链;国际文化贸易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5-00070-11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是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软实力和话语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大战略。长期以来,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促进中外文化交融互鉴的主要路径。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外文化以“送出去”为主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要求。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上,应积极培育文化企业,将其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主体,要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将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作为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的载体与路径。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卖出去”为主的模式不仅可以将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销往海外获得经济利益,还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增加与外国文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的发展经验,从而有助于我国文化企业自身的发展,并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一、加快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在我国大力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背景下,促进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从“送出去”走向“卖出去”,

收稿日期:2021-10-10

作者简介:徐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招标课题“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路径与对策研究”(KT202111)的研究成果。

对于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化产业“走出去”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实现“双效统一”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对外文化交流,将我国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与传播,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送出去”的方式成为早期国外了解、熟悉、认同中华文化的最主要渠道。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实力的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渴望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华文化,“送出去”已难以满足国际文化市场的需求。我国文化“走出去”必然要突破传统的、单向的传播方式,从“送出去”走向“卖出去”,从对外文化交流走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文化贸易和对外文化投资,实现文化产业“走出去”^[1]。

文化产业“走出去”对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具有多重效应。一是有利于激发市场各类主体的活力,以往文化“送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国有文化企业,而“卖出去”将促进众多民营文化企业加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行列,扩大我国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规模,提高国际影响力。二是弥补单向传播的不足,将国际市场需求与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结合起来,有效解决过去“送什么”“送多少”的问题。三是实现对外文化产品的持续性供给,克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频次局限,形成对外文化产品的订单式管理。四是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送出去”主要是实现社会效益,“卖出去”则能“双效统一”。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产品的价值不能单以国际市场定价来衡量,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被国际市场所接受的文化产品应以“卖出去”为主,对于还不能广泛被国际市场所认知和理解的文化产品则应以“送出去”为主,是实现“双效统一”,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原则。五是文化以产业的形式“走出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有利于减少国外特

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疑虑,有利于我国文化平等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来。

(二)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是提升我国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举措

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如果说以对外文化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走出去”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软实力,而以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产业“走出去”体现的则是对国际规范、标准和国际机制设计的制定和控制的一种国际话语权。不论哪种产业的国际贸易与投资,都是在一定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下进行的,对于文化产业的国际争论尤为激烈。正因为如此,制定怎样的规则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文化产业只有更大规模“走出去”,才能在欧美等文化强国中站稳脚跟,提升制定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国际话语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利益,积极建设兼顾自由与文化多样性的公平公正的国际文化市场环境。

(三) 文化产业“走出去”是带动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在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不确定因素增加、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对外文化贸易和对外文化投资成为新的增长点。有关研究表明,文化产业发展相对独立于经济周期,甚至具有典型的“反经济周期”的特征,即著名的“口红效应”,也就是说,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文化消费却显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由此可见,文化产业“走出去”本身就有助于我国在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动荡和调整时巩固和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

文化产业“走出去”也为其他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通常认为,文化距离和文化差异是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因素。减少不同文化导致的摩擦、误解和误判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提升对外投资的成功率。对于既有的国际市场,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进入,可以进一步增进贸易与投资双方的了解和互信,有利于扩大贸易与投资规模;对于有待开辟的新

市场,我国文化产业可以先期进入,以文化认知引领商业认知,有利于降低我国开拓市场的成本,并为其他产业贸易与投资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是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促进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不少文件和政策,通过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努力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在文化对外交流的基础上,以文化产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大格局,与沿线国家的民生、消费、休闲密切结合,同时也带动沿线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多层次建立共同语言、增强互信,加深彼此感情^[2]。

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现状、问题和挑战

(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2015年1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创新对外文化贸易方式,推出更多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当代中国形象、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文化部制定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主要是在签署政府间文件、深化合作机制(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等)、加强高级别文化磋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晤、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部长会议、中阿文化部长论坛、中国与东盟“10+1”文化部长会议)等方面为“一带一路”文化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日益加深。

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保持平稳发展。据商务

部有关统计,2019年,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14.5亿美元,同比增长8.9%。其中,出口额为998.9亿美元,同比增长7.9%,进口额为115.7亿美元,同比增长17.4%,贸易顺差达883.2亿美元,同比增长6.8%。从贸易方式上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66.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03.3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一般贸易出口额增长率从4.8%上升到20.9%。加工贸易出口额则从2018年的376.2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335.0亿美元。从商品类别上看,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出版物出口增长较快,增幅分别为11.7%、5.6%和4.8%。从国别和地区看,我对东盟、欧盟出口增长较快,分别增长47.4%、18.9%,对美国出口下降6.3%,为264.87亿美元,但美国仍然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为德国,达12.10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1.85亿美元,占我国文化贸易进口总额的10.4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为203.4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进口额为25.9亿美元,同比增长17.9%。从企业性质来看,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共出口640.3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311.9亿美元,国有企业出口46.7亿美元。从国内区域分布来看,对外文化贸易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19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总额排名前六位的省(市)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和福建,其中广东2019年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87.69亿美元,占全国总额的52.73%,同比增长10.83%。

(二)江苏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

江苏作为文化大省,文化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文化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江苏文化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走出去”,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合作

近年来,江苏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一是每年组织新闻出版系统积极参加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加大拓展“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力度,以主要省份参加南非书展、布达佩斯书展等国际书展。海外布局工程“江苏书坊”通过与海外集团实行强强联合,互换销售渠道,互动文化服务贸易,“江苏书坊”已成为实物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举的多功能“走出去”基地,探索实现“以出带进”“以进养出”“进出互补”的良性循环模式。二是演艺业、工艺美术业、艺术品业等领域也拓展了对外交流的局面,推动具有江苏特色、中国风韵的艺术在国际舞台得到展示。近年来,“走出去”的项目由以表演艺术、造型艺术为主拓展到江苏传统“非遗”工艺展示、遗产保护、文化产业等多领域。与此同时,积极参加海外“欢乐春节”、外国文化年(节)、友好省(城)周年庆等活动,“精彩江苏”已成为我省具有影响力的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

2. 对外文化贸易不断拓展

江苏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对外贸易的品种、数量、码洋、交易额逐年提高,境外市场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一是广播影视产品出口成效显著。《非诚勿扰》等综艺、《白日焰火》等电影出口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动画电视《西游记》创下亚洲动画片单篇销售金额最高纪录。二是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势头强劲。近年来,江苏数字出版物、学术文献资料、网络游戏等在境外市场取得较好收益。三是印刷复制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发挥重点印刷企业的规模效应和品牌作用,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市场获取收益。四是工艺美术产品出口保持逐年增长。江苏爱涛文化产业公司的产品、江苏桃园家饰的草编文化工艺品、扬州万木春纸制品等成为江苏工艺美术业对外出口的亮点。五是版权输出工作总体趋势向好。近年来,江苏版权输出和引进在数量上双双提升的同时,逆差逐步缩小。在输出的地域方向上,由过去单纯的华语国家和地区逐步向更多语种更多国家和地区转变。在版权

输出类型上,由以往集中于传统内容向兼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转变。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广电总台、慈文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牌高校出版社为主力,江苏在输出品种类型、规模数量上居全国前列。

3. 各类文化企业赴海外投资步伐加快

江苏文化产业境外投资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在不同洲际、国家和地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呈现出国有“集团军”与民营“突击队”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一是龙头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目前江苏省内文化“走出去”的龙头企业是凤凰集团和江苏广电两家国有集团公司。二是民营企业“走出去”逐步形成规模。江苏经纶文化传媒集团在加拿大投资成立经营实体,与当地高等教育、专业学术机构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实现产业落地和产品输出。

(三)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外向型文化产品结构有待优化,精品不多,品牌建设力度不够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离不开优质的文化产品,而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文化产品尤其是艺术产品的创作需要较长时间的积淀,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走出去”是一个较为艰难的过程,尤其离不开优秀精品的支撑。根据商务部有关数据,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以杂技、武术等吸引观众眼球的“技艺文化”为主,缺少对文化内涵、价值观的深入挖掘,很少阐释文化意象背后的象征含义。我国文化在现行国际交流与传播过程中显现了文化内容浅层化的典型特征。文学、电影、电视、戏剧、歌曲等唤醒观众情感的“内容文化”较少,相对较难理解的文化价值观类的文化产品也不易被接受,难以形成文化产品的持续影响力。一些文化产品片面迎合西方观众口味,或者突出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另一些文化产品则忽视对国际文化市场的研究,片面强调原生态。此外,随着国际文化消费日趋多元化,同质化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已难以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总体来

看,我国文化产业还缺乏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需求的特色产品和精品。

知名文化品牌尚未完全形成,缺乏市场影响力,也是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好莱坞、韩国的综艺、日本的动漫等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文化品牌所产生的影响力不仅能够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而且有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而带动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目前,中国文化品牌的建设力度不够,一方面,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和服务缺少新意;另一方面,营销观念和方式的前沿性不够,文化贸易的商业化运作不足。

2. 对外文化贸易水平不高,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近年来对外文化贸易总量不断增加,但仍和我国开放型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从全球文化产业链来看,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产品加工能力突出,在创意设计、研发、营销、版权等高附加值领域还缺乏国际竞争力,仍然属于被动参与全球文化产业分工的阶段。对国际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律不熟悉,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渠道和营销网络短板明显,往往受制于国外代理商。例如,在海外我国的演艺剧团一般只负责剧目演出,而没有参与到演艺项目的整个产业链运作,虽然承担的风险较小,但演出收入也有限,约 70% 的利润由外方获取。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区域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省(市),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进展较慢。文化产品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贸易还有待加强^[3]。

3. 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数字文化产品可以在突破物理、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同时让更多文化内容得以传播,以实现产品贸易类型的多样化。在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际文化消费方式转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要与数字技术进一步融合发展。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融合程度还不够高,要么重技术轻内容,要么重内容轻技术,协调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一方面,文化企业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撑,向数字科技领域跨界发展面临很高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与数字科技产业的效益存在一定差距,文化产业难以吸引高端数字科技创新领域的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资源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与数字科技的融合。

4. 文化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缺乏

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目前,既缺乏文化专业人才,又缺乏文化管理人才,而既精通专业又熟悉企业管理的复合型文化人才更少。内容策划和翻译编辑人才不足,导致外向型文化产品缺少吸引力和感召力。现代营销推广人才不足,影响了国际市场营销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人才不足,束缚了对外投资、参股收购和本土化运作的步伐。此外,数字文化产业相关人才严重缺乏,制约了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运用数字技术开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能力。

(四)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1. 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文化领域竞争日益激烈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大力发展的重点和支柱产业,特别是发达国家仍然主导文化创意产品、文化服务、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制高点,并不断增强文化影响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输出,争夺文化市场,不少沿线国家也深陷大国竞争,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文化企业是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的主体,他们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掌控全球文化市场,不仅占据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还不断设置标准,在新闻舆论方面主导话题、带节奏,排斥他国文化。我国文化

产业体量虽然日益增加，且国内文化市场庞大，但这一规模优势还没有与国际文化市场和要素对接，还没有形成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中的竞争优势，我国文化企业集聚和配置国际文化资源的能力还不强。

2. 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

文化产品与一般出口产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中华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要克服意识形态隔阂的难题。当前的困境是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一方面是价值观的差异和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面临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文化“走出去”不断设置障碍的根本原因，并导致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媒体偏见、观众认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之下。

3. 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的壁垒

阻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市场准入壁垒主要包括歧视性税收、非关税壁垒、直接数量限制、服务壁垒以及严格的审批制度。还有一种非市场壁垒就是“文化折扣”。从英美等国的对外演出来看，其演艺产品以音乐剧和大型歌舞剧为主，这两种剧目类型较少受到“文化折扣”的影响，但其他文化产品几乎都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文化折扣”。我国的文化产品由于社会制度、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审美差异等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文化折扣率很高，大多数外国消费者由于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或者因语言等方面的障碍，难以认同我国文化产品的核心内容。此外，其他国家的文化政策也会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壁垒，例如法国一向主张“文化例外”，要求对文化进行特殊保护，从而阻止别国文化产品的涌入。

4. 对外文化投资的国别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我国对外文化投资的空间，但也对我国文化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众多，人口庞大，市场潜力巨大，但地缘政治复杂，其中

也有不少交流频次极少的国家。我国与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社会环境、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差异较大，有关的交流渠道和平台载体还较为欠缺，企业获得的信息也有限，面临的问题和承担的风险就会更多一些，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海外投资服务保障能力和境外争端应对能力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不少国家文化基础设施还相当薄弱，缺乏文化产业合作开发的硬件条件。不同文化圈的市场需求差别很大，能否针对不同文化圈制定不同的投资战略，既保持中国文化产品的特色，又能实现“本土化”，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

5.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重影响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世界贸易与投资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际文化市场也受到波及，文化生产经营活动停止，很多文化类国际展会被取消或被延期，许多文化企业无法正常运营，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受到阻碍。同时，由于我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西方国家的疫情持续蔓延而被迫采取居家隔离的措施，从而引发了慢节奏下精神生活的回归，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上升，但国外的生产因疫情受限无法满足本地的市场需求，因此增加了对我国文化产品的进口。新冠肺炎疫情还促使文化与互联网加快融合发展，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更加高速、便捷的渠道。

6. 中美贸易摩擦带来局部影响

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不仅中美经贸关系遭到破坏，而且作为“桥梁”的人文交流也出现了裂痕。中美文化贸易的主要领域集中在文化产品、影视版权、旅游贸易等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各领域的影响不同。但从中美贸易摩擦演进的趋势看，“贸易摩擦”向“文化冲突”的延伸将会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当前，美国拜登政府有调整对华经济战略的动向，但具体举措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创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

（一）丰富对外文化贸易方式

就开放型经济而言，贸易与“走出去”是不一样的概念。但在文化产业领域来说，通常把对外文化贸易看成是“走出去”的最基本形式和主要渠道。

对外文化贸易主要有四种贸易方式：一般贸易、加工贸易、保税物流以及其他贸易。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创新能力、文化竞争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结构也在升级，最初的加工贸易方式逐步被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方式所替代。特别是保税物流和其他贸易这两种方式崭露头角，呈现快速的增长趋势。当前，其他贸易已经成为对外文化进出口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贸易方式。

建立海外文化产业出口基地是针对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过于分散、形不成合力的现状，而采取的一种提高我国海外文化产业集聚程度，发挥集聚效应的高层次的“走出去”方式。海外出口基地的建立不是单独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它是多个企业的集合，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同时，国家也要给予扶持和鼓励。更重要的是，要将国内的文化产业集群建设和海外出口基地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将国内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国外出口基地的国内基地，国外出口基地作为国内文化产业集群开拓海外市场的桥头堡。

（二）稳步推动对外文化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出去”的最重要形式。文化企业向外拓展时，面对国外业务拓展成本、知识产权壁垒等困境，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将国外文化企业纳入公司内部，从而获得国外成熟的生产技术、版权内容、运作模式、资源禀赋、政策许可等有形和无形资源。并购的主要模式分成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横向并购是指相同或相近产业、企业、生产工艺或产品间的并购，目的是消除竞争对手或形成规模经济。纵向并购是指产业链不同环节、上下游企业间的并购，根据上下游的方向，又可

分为前向并购和后向并购。混合并购是指不相关的行业、企业间的并购，通常是为了多元化经营。我国文化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投资领域为演出剧场、电视台、电视频道、电影公司等，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基础设施、输出渠道和平台载体，同时也可以增强我国文化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除了跨国并购外，另一种方式是文化企业绿地投资，直接在海外投资设立分公司或分支机构，或者在海外建立集生产和营销于一体的直营企业，开展本土化生产和营销，从而提升对海外文化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并能够积极创建自主文化品牌。

（三）鼓励中外战略合作

文化产业借助国际合作方式“走出去”是较为普遍和有效的形式。在演艺业方面，文艺演出团体通过与国外知名商业演出机构或演出场所建立合作关系，结成战略联盟，相互提供市场，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大型演出，另一方面争取增加单独演出场次和场所。一些中小型演出团体则可以寻求与国外专业演出代理公司合作，充分利用其熟悉国际演出运作机制的经验和市场资源来提高运作效率，增加演出机会，提高演出质量。对于某些特定类别的文化产业以及市场监管较为严格的国家，渠道代理模式是进入各国市场的必要手段，面对所在地区对发行渠道的垄断，多数企业会寻求与当地的渠道商签订长期供应协议，形成稳定的产品需求。

此外，还有加盟共享模式，是指我国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知名文化品牌与当地知名品牌合作，结合双方优势资源共同推动文化产品的生产开发和文化服务提供。与渠道代理模式不同的是，选择加盟共享模式与当地合作，往往是主动在商业上寻求更大主动权的理性决策，以有效降低商业风险、实现企业盈利。

四、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文化自强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根本，既要

坚持民族文化保护，又要不断推动文化内容和载体的创新，适应对象国的文化需求，传递正能量，传递我国的文化精神，做好“中国故事”的信息传播，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增强中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各级政府、“走出去”的文化企业、中介机构要形成合力，打造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支撑机制^[4]。

（一）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重构全球文化产业链，集聚和整合全球文化资源

强大的文化产业是文化传播的根本依托。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不能满足于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而要整合全球各类文化要素和资源，在文化观念、科技、协作方式等方面实现国际化的跨越。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利用我国国内文化市场的规模效应，通过并购、外包、战略联盟等方式与产业链上的其他主体实现资源整合，从而降低独立开发成本，分散经营风险。尤其注重文化创意、品牌塑造、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同时，抓住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有利机遇，不断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要善于集聚和整合国际文化资源，开展集成创新，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品牌，还能够为我国其他产业、技术和资本“走出去”提供文化支撑。

（二）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进程，创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数字化是文化产业改革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存储、传播和消费方式，也推动了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文化产品突破国界限制，将文化内容快速推广至全球市场。在数字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甚至在不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要把文化产业数字化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路径，发挥我国数字经济的优势，

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对文化产业赋能，发展创意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对外文化产品和服务，创造新业态，激发新的文化消费，在文化贸易与文化投资最具成长性和活跃度的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三）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坚持规划引领，鼓励我国文化大省（市）和重点区域制定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专项战略规划，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发展原则、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和政策措施等。加快制定《文化产业海外投资指导意见》，为我国文化产业海外投资、经营和发展提供政策指引。

建立健全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激励机制，切实帮助企业在“走出去”初始阶段盈利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在国外站稳脚跟。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建议重点省（市）设立文化产业“走出去”专项引导基金，提供税收激励，给予贴息、免息和奖励，特别是在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初始阶段要给予专项资助。加大对“走出去”成效显著的单位、企业的资金奖励。增加对新型业态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投入，加强文化企业与电信运营商、网络公司、电商平台的沟通协调，畅通开展合作的信息渠道，鼓励相关企业跨界融合发展。

对出台的促进和支持政策进行跟踪评估有利于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文化企业在国外遇到的情况和问题瞬息万变，及时掌握企业动向，可以适时对政策进行微调 and 预调。首先，明确对政策进行跟踪评估的范围，凡是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尤其是提供的金融、财税和其他奖励鼓励政策都需要纳入政策评估体系。第二，政策跟踪评估的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定期地对政策执行和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坚决杜绝骗取国家优惠政策、挪用专项扶持资金的行为；二是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定期召开文化出口企业和对外文化投资企业座谈会，了解政

策执行效果,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第三,加强文化企业“走出去”的统计工作,由文旅、商务、海关等部门对每年文化产业“走出去”工作作出报告,全面评估对外投资管理的效果与影响,为指导我国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及时调整对外投资政策、改善管理和服务等提出建议。第四,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经验,更加注重研究和制定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后续政策支持,延长政府政策的支持链条,使其贯穿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的全过程。与企业“走出去”的前期主要以金融和税收等支持政策不同,后续支持政策则主要在信息、咨询等方面。对于大型国际文化投资项目应有专人负责跟踪服务,及时了解企业信息和诉求,协助企业应对各类可能出现的风险。

(四) 积极打造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平台和合作交流机制

借助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平台,实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工程。与设在沿线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对口年度合作,通过演出、展览、讲座、培训等形式向沿线国家民众全面展示我国的精彩文化。推荐涉沿线国家文化贸易优秀企业和项目纳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引导文化企业充分利用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深圳、北京)的综合服务功能,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沿线国家市场。充分利用文化保税区、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多种功能区的体制机制和开放优势,打造一批集文化产业各环节,以及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产品集散中心。

利用好我国现有的与国外地区和机构的合作交流机制,继续办好有关的投资合作推介会、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境外投资考察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发挥我国友好省市的优势,由各级政府出面积极与国外友好省市政府部门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和投资促进机制,为文化企业投资海外牵线搭桥。同时,商务、外事和侨务等部门协同合作,挖掘新的投资机遇,开拓新的投资市场。在国外

文化投资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设立投资促进机构或服务中心。

不断创新打造新平台、新渠道。利用既有平台、渠道的辐射效应,同时加强与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领)馆文化处(组)、中资机构以及沿线国家文化机构、华人华侨社团等的沟通联系,不断建立新平台、新渠道,进一步拓展与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空间。积极参与世界知名电影节、动画节、演艺节庆、图书会展、游戏会展等活动,同时打造我国自己的展会平台,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促进。

推动有利于各类文化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载体建设,建立一批文化出口基地。在有条件、有意愿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发建设文化产业园,发挥我国在建设开发区方面的经验优势,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产业、产品融入入园,形成与当地文化优势互补、百花齐放、良性互动的境外文化产业园区。

(五) 建设文化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平台

文化企业“走出去”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信息以及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在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应当建立可靠的海外风险及防控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5]。第一,整合信息资源,由商务、文旅等部门综合汇总由各政府机构、驻外机构、商会、中介组织、媒体等提供的信息,将信息进行分类,建立文化产业信息数据库,其中包括国别投资环境数据库、交流合作项目数据库、国际知名会展信息库等等。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报告主要是宏观信息,无法满足文化企业的微观需求,还需要建立文化行业、产业等信息库。第二,加强动态信息的搜集,及时捕捉投资机会,跟踪投资动态,监控投资风险。第三,重视信息的筛选,尤其注意加强对网络信息真伪的甄别,切实提高信息的质量。第四,加强对信息的分析和解读,设立专门的机构或委托有关专

家加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文化投资重点国家开展研究，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充分发掘信息的价值，帮助文化企业更好地有效利用信息，减少企业对信息的误读和误判。第五，加强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不因部门和地域的因素而产生信息保护主义，保证政府和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畅通。第六，尽早建立我国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将各类信息转换为更具有相关性、及时性、可靠性以及可比性的信用评级信息，摆脱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

（六）培育和发展国际文化贸易与投资重点企业，做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主体

把打造“走出去”龙头集团，包括文化产业集团和文化贸易流通企业，以及重点品牌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加大政策、资金的优惠扶持力度，鼓励国有文化企业实施本土化战略，进行兼并重组，充分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要支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进一步发挥国有文化企业“集团军”与民营企业“突击队”的作用。建立健全协调机制，整合“走出去”企业、品牌、市场资源，防止恶性竞争，避免重复投资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构建企业成长培育机制，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头部企业和细分领域企业。以头部企业带动我国数字文化产业链上相关的内容生产、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等企业的共生繁荣。同时，积极引导细分领域企业的特色化发展，依托数字科技和文化创意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装备制造、软件开发、网络文学、数字游戏、动漫影视、移动视频、数字音乐等产业门类的精细化发展。鼓励和支持各类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与文化企业开展技术、项目等方面的合作。引导互联网及其他数字科技领域龙头企业布局文化产业，支持企业实现垂直、细分、专业发展。支持数字科技企业与文化企业采取市场并购、项目合作、捆绑营销等多种融合模式，培育跨界文化与数字科技的新型市场主体。大力

扶持中小微数字文化企业，加强中小文化科技企业的运营孵化，鼓励其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强化特色经营、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对于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文化品牌的企业，要同步加快实施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和企业的数字化，促进“内容为王”与“流量经济”协调并进。

（七）培养懂文化、善经营、会外语的外向型人才队伍

不同国家之间在语言、风俗、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再加上国际文化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复杂性，导致中华文化“走出去”遇到了许多限制与障碍，因此需要专业人才团队，包括能直接进行国际对话、又熟悉文化产业运作规律的律师、会计师、投资家、经纪人、项目经理、文学翻译等人才，来应对这些挑战^[6]。推动有关高校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加大国际文化贸易和投资人才的培养力度，并实行高端人才引进战略，来保障和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

对于在海外进行文化投资的企业而言，要更加重视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人才的工作。第一，在引进文化人才方面，要实行人才本土化战略。在海外有几千万的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要充分吸引这些人才，国际化人才是国际定价，不能照搬国内的工资标准，要创新薪酬机制，做到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此外，必须吸引外籍人才加入，员工越多元化、本土化，企业国际化就越容易成功。在体制机制上，民营企业吸引外籍文化人才没有制度障碍，但在国企当中，在人才引进机制上进行改革势在必行。第二，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可以由政府组织各类培训活动，凡有“走出去”意向的企业，都需要让准备派驻国外的员工参加培训，对投资国当地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有充分了解。定期选派国内人才到国外知名跨国文化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设立“一带一路”海外人员培训的专项基金，用于培养“一带一路”文化产业领军人才和培训中资企业职工。

(八) 推动中介服务机构同步“走出去”

目前对于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各项配套服务都较为滞后，金融、保险、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未能同步“走出去”，使不少文化企业在海外感到孤立无援。而企业对于国外提供的这些服务较为陌生，有些价格过于昂贵，对于中国文化企业的情况也不一定熟悉，因此，必须大力支持本国的配套服务业“走出去”，给企业以有力的支持。第一，鼓励金融、保险等机构“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文化投资比较集中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主要为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服务，同时也为企业一般性金融业务，而在海外并购融资时则可以深度参与，既可以随时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可以协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和保险机构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丰富金融产品，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第二，推动我国的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国际化，培育大型的具有跨国服务竞争力的事务所。法律服务方面，由于我国律师业没有实行开放政策，在没有“引进来”的情况下就“走出去”困难很大，因此大力培养熟悉国际法律的人才当务之急，主要是为企业提供基本的法律咨询。会计服务业方面，由于我国会计师必须取得国际专业资格才可以在当地注册执业，而且国际会计市场基本已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走

出去”困难重重，目前应该以为文化企业提供会计和财务咨询服务为主。因此，现阶段应着重鼓励法律、会计、咨询等服务业派出专门人才“走出去”，为我国文化企业在海外的贸易与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第三，提高我国文化经纪机构国际化水平，与国外知名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保障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田丰. “卖出去”比“送出去”更能使文化“走出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7-22.
- [2] 李怀亮. “新冷战”条件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选择[J]. 对外传播, 2020(8): 7-10.
- [3] 花建. “一带一路”战略与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30-39.
- [4] 冯永昌. 文明对话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4): 65-69.
- [5] 方英, 郭周明, 薛焱. 中国对外文化直接投资: 现状、问题和对策[J]. 国际贸易, 2020(8): 87-96.
- [6] 张琼, 聂平香. 提升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发展水平的思考[J]. 国际经济合作, 2020(5): 118-126.

责任编辑: 宋好